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 科舉、出版與社會

王赫*

明初永樂間敕撰《四書大全》，一方面強化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地位，另一方面欲使《大全》本身成為一代經學權威。雖然內府刊刻和頒發《大全》，但坊刻本《大全》也頻繁出版，終明之世在《大全》的流通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明代坊刻本《四書大全》的文本始終不限於內府原書的內容，體現出各時期編纂者與閱讀者不同的學術取向。考察歷史記載及今存實物，可見宣德以來直至明中葉在建陽興盛的坊刻本《四書大全》繼承元代以來科舉用書的樣式，其內容由明初劉剡增補內府原本而成，劉剡本又成為此後所有坊刻《大全》的底本；劉剡所增入內容有益科舉之需，然而同時亦補充名物制度的考據，可視為宋元朱子後學的考據學在明初的餘緒。約在萬曆後期，建陽書林余氏的新刻本《四書大全》一變舊式，成為最新流行之本；余氏又發明了一種高頭講章式的「參補」本，以眉評形式增入明儒新說，其受陽明學影響尤其顯著，亦有鮮明的折衷朱王傾向。而晚明《四書大全》的坊刻又延伸到江南的南京、蘇州等地，翻刻、翻印頻繁，蘇州本附刻王應麟《考異》也體現出考據學的興起。而崇禎間張自烈在南京編纂的《四書大全辯》不僅以修訂《大全》之名表達折衷朱王的學術觀點，更成為後期復社展示力量的工具。在並無有效出版監管制度的時代，《四書大全》一書不是剛性的，而是一種流動的、可塑的文化資源；考察《四書大全》在明代的刊刻與改編，可見明代的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的密切關係。

關鍵詞：《四書大全》 明代經學 明代科舉 明代出版 復社

* 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為二〇二二年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計畫「15-19 世紀東亞世界《四書五經大全》的刊刻、流通與閱讀」(KYCX22_0039) 的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永樂年間敕撰《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是明成祖朱棣革故鼎新的重要舉措，在明代經學史和科舉史中，《大全》至少在名義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宋元以來「四書」的地位逐漸高於「五經」，特別是元代以來科舉制度最重「四書」，因此三部《大全》中，《四書集註大全》¹（後簡稱《四書大全》）的重要性顯然高於《五經》和《性理》二書。關於《四書大全》的編纂，其〈凡例〉已明言以南宋吳真子《四書集成》和元代倪士毅（1303-1348）《四書輯釋》為藍本，故清代學者譏為「竊盜」「剽剽」，對其價值也基本一筆抹殺，² 此種態度乃明清思想學術風氣之轉變使然。而近年研究中，學者已經超越了這種全盤否定和籠統批判的態度，開始深入發掘其編纂過程體現的學術史脈絡，並將其與地域視角結合，³ 推進了相關研究。

而若全面考察《大全》一書在明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與作用，則不僅需要研究此書的產生，同樣需要關注它在社會中「再生產」的實踐。故此，本文的研究重點不在於明初《四書大全》的編纂，而在於永樂十三年（1415）《四書大全》成書後的刊刻與傳播，更加偏向社會文化史的視角。在這方面，唐潤熙討論了《大全》明清版本的流變，且指出了「私刻本」（包括漢語學界所謂「坊刻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⁴ 但其對明代情況的敘述和分析尚多闕略；閔春

¹ 本文於古籍書名及引文原文中從言之「註」字，均保留其字形，如《四書集註大全》；而在一般意義上提到「《四書章句集注》」「大注」「小注」「注疏」等時，則從今正字法作從水之「注」字。

²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一八，頁1041-1043, 1073；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三六，頁301-302。

³ 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3：62-69；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成大中文學報》49（2015）：79-106；陳逢源，〈「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2016.1：51-64；陳逢源，〈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成大中文學報》63（2018）：43-72；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頁18-186；孫廣，〈《四書大全》編纂考詳——以《孟子集注大全》為核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3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頁178-195。

⁴ 唐潤熙，〈《四書大全》판본의 변화와 程朱理學의 演變〉，《中國語文論譯叢刊》20（2007）：271-274, 277-282。

調查了數種今存明代《大全》坊刻本，但囿於時代條件，所見材料太有限；⁵ 朱冶已指出《大全》在明代有多種坊刻本，但尚未具體討論；⁶ 李子歸指出了明建本《大全》改動官本書名及卷數的現象，但未留意建本《大全》獨特的增補內容。⁷ 此外，學者也已注意到晚明東林、復社士人刊刻和改編《四書大全》的行為：三浦秀一指出，崇禎帝對民間書院心存疑慮，重視學校，從而推行《大全》等官方學說，故當時士人紛紛刊刻《大全》的合編本和修訂本；⁸ 朱冶也曾以復社成員顧夢麟《四書說約》為中心探討晚明士人對《大全》的改纂。⁹ 三浦氏看到了這些書籍的序跋和凡例中對《大全》的推崇和對劣質坊刻本的批判，朱冶則認為這是晚明士人對王學流弊的反撥和對經典、對程朱理學的復歸。其言誠是，然而，如果以商業出版為視角，則可洞悉其中更加複雜的現象。又三浦氏、周啟榮與郭沖探討了明末清初張自烈《四書大全辯》的政治和社會背景，¹⁰ 但關於明末相關史實及此書與復社的關係，其論述尚可加以補充或修正。

綜上，本文擬闡釋《四書大全》於明初的典範意義之後，在歷史記載的基礎上，更以今存實物可考的明代坊刻本《四書大全》為中心，通過這些書籍的形式與內容，探究明代經學與商業出版和社會文化的關係。而因《五經大全》與《四書大全》性質相同，關係密切，且多同時刊刻，故下文在分析《四書大全》時，多以《五經大全》的情況作為參照。

⁵ 閔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頁 26-28, 39-44。

⁶ 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頁 188-194。

⁷ 李子歸，〈明代建陽的書戶與書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6 (2018)：41。

⁸ 三浦秀一著，石立善校譯，〈張自烈《四書大全辯》與明末清初的士風〉，《哲學與宗教》第 6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202-203。

⁹ 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頁 194；朱冶，〈晚明復社與經典改纂：顧夢麟等編《四書說約》初探〉，張藝曦主編，《結社的藝術：16-18 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頁 561-576。

¹⁰ 三浦秀一，〈張自烈《四書大全辯》與明末清初的士風〉，頁 201-216；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36-239；郭沖，〈晚明出版與政爭〉（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5），頁 45-49。

二·經學新權威與書坊的參與

(一) 經學新權威的建立

在經學史中，《四書集註大全》的體例與其藍本《四書集成》《四書輯釋》相同，屬於「纂疏」體，或稱「纂釋」「集疏」等。顧名思義，這是一種「疏」體，既釋「經」又釋「注」，其功能與六朝隋唐「義疏」「正義」相同。然而其疏文無統一的面貌，而是從先儒傳注、文集和語錄中纂集而來。¹¹ 顧炎武指出，從南宋真德秀(1178-1235)「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作《四書集義》開始，宋元諸儒不斷承襲和增刪，《附錄》《集疏》《纂疏》《集成》等紛紛問世，《大全》則是這種纂疏體著作的集大成者。¹² 據〈四書集註大全凡例〉，《大全》共纂集 106 家經說，其中除鄭注、孔疏之外全為宋元儒之說，包括朱子本人《章句集注》之外的說解。¹³ 明儒將「四書」經文稱為「白文」，將朱熹《章句集注》稱為「大注」，¹⁴ 而《大全》所纂集諸家之說則隨文附在大注之下，在內府刻本中呈現為雙行小字，被稱為「小注」。

顧永新以宋元為分界，將中國古代經學文獻的主流分為先出的「正經注疏」和後出的「五經四書」兩大系統，每個系統都包含三個級次的經學文獻，¹⁵ 這實際上精闢地指出了中國經學文獻史中的「唐宋變革」。顧氏所謂「正經注疏」系統可以《五經正義》為代表，呈現出「經—注—疏」三級結構；而「五經四書」系統則可以《五經四書大全》為代表，呈現出「白文—大注—小注」的三級結構。這兩種結構在經學解釋學上呈現出相似的功能；而考慮到《正義》和《大

¹¹ 參見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頁 65-68；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頁 67-70。

¹²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一八，頁 1041-1042。按，今見真氏所著書名為《四書集編》。

¹³ 胡廣等，《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據明內府刻本影印），〈四書集註大全凡例〉，頁 21-27。下文所引永樂原本《四書大全》內容均據此本，引用時注明「（內府本）」。

¹⁴ 在《四書集註大全》中，屬於朱熹「大注」層次的內容除《學》《庸》之《章句》共二卷、《論》《孟》之《集註》共三十四卷外，尚有〈大學章句序〉〈讀大學法〉《大學或問》〈中庸章句序〉〈讀中庸法〉《中庸或問》〈論語集註序說〉〈讀論語孟子法〉〈孟子集註序說〉，這些內容都有「小注」。

¹⁵ 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4。

全》的官方背景，二者更有相似之處，都是「動用國家權力對經學文本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整頓」。¹⁶ 眾所周知，中古義疏發展到隋唐，逐漸呈現出「疏不破注」的特點（雖然對此不能作絕對化理解），而敕撰《五經正義》，各經專取一家之注本以作疏，即意味著此家經注成為一代權威功令。在這個意義上，《五經四書大全》又何嘗不是如此？明成祖與唐太宗何其相似，皆於新朝甫定時艱難得位，都是孳孳欲有作為之君主；故《大全》的敕撰和頒行，當隱含模仿《五經正義》，創造新的「經學統一時代」之意；¹⁷ 而相比《五經正義》，正如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所言，以程朱理學為宗旨的《四書五經大全》尚別有強化學「道統」的意識。¹⁸

那麼《大全》的敕撰和頒行，建立了哪些經學新權威呢？在此僅就本文關注的《四書大全》來說。首先，《大全》強化了作為「大注」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地位。¹⁹ 從文本的角度說，《章句集注》一書在宋末至元代版本不一，文本彼此小異：佐野公治指出，真德秀、金履祥 (1232-1303)、胡炳文 (1250-1333) 等學者都採用「淳祐本」系統的文本，而陳櫟 (1252-1334)、倪士毅師徒則採用聲稱是朱熹嫡孫朱鑑認定的朱子晚年絕筆定本，即「興國本」系統的文本。而明修《四書大全》以倪氏《四書輯釋》為藍本，實奠定了「興國本」文本的地位，²⁰ 則「興國本」《四書章句集注》的文本，可謂因《大全》而後來居上。從學術地位的角度說，眾所周知，朱子學在南宋的命運坎坷，曾被定為「偽學」；然而經後學傳承與發揚，《四書章句集注》終於在元仁宗皇慶二年 (1313) 取得科舉功令地位，明初科舉從太祖時期就繼續尊用《章句集注》，²¹ 而永樂間《大全》的頒行，則又從學理上強化了《章句集注》的權威：《大全》所存「小注」主要出自朱子後學之手，所以他們對朱子《章句集注》推崇備至，其表彰和讚歎的話語都被收入《大全》。如《論語集註大全》卷一小注引「新安陳氏曰」，

¹⁶ 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頁 68。

¹⁷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35-139。

¹⁸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07.

¹⁹ 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頁 105。

²⁰ 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林慶彰校訂，《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2014），頁 182-195。

²¹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八一，頁 2018-2019, 2026；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〇，頁 1693-1694。

王赫

在討論《集注》對《論語》的解釋後，讚歎曰：「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²² 朱子儼然是孔子唯一正確的闡釋者。又如同卷小注又引「新安陳氏曰」：

《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²³

可謂將《集注》捧上神壇。然而《大全》中小注解釋朱熹《集注》的方法，則實非僅靠默會，而是如《孟子集註大全》卷三小注所提出的「字字體認」。²⁴ 陳逢源指出，這種對朱子《集注》價值的強調多見於新安一系學者的小注中。²⁵ 而新安學脈之外亦可見這種推崇，其例如《論語集註大全》卷一〇「唯酒無量不及亂」句下，《集注》釋之云「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而小注引「覺軒蔡氏曰」：

《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²⁶

這種讀《集注》的方法，真可謂將「字字體認」落實到近似穿鑿的程度了。朱熹嘗謂「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²⁷ 所以宋元後學將《章句集注》一字一句皆視作奇珍。在《四書大全》頒行之前，這些觀點都只以民間話語的形式存在；而《四書大全》的頒行，豈不是對「小注」中的這些評價給予官方認可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大全》不僅確定了《四書章句集注》的文本，還奠定了其「一字不可增減移易」的地位。

其次，《大全》的頒行當然還奠定了「小注」本身，即宋元朱子後學經說的地位。確如清儒所言，《五經四書大全》襲用元儒成書，此無可置辯；然而在元代朱子後學中選取哪一派的著述作為藍本，其間則亦有學術和現實的考量。陳

²² 胡廣等，《四書大全》（內府本），《論語集註大全》卷一一，頁 1486。

²³ 胡廣等，《四書大全》（內府本），《論語集註大全》卷一一，頁 1516。

²⁴ 胡廣等，《四書大全》（內府本），《孟子集註大全》卷三，頁 2222。

²⁵ 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頁 102-104。

²⁶ 胡廣等，《四書大全》（內府本），《論語集註大全》卷一〇，頁 1438。

²⁷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九，頁 437。這句話當然也作為「小注」被收入了《大全》，見胡廣等，《四書大全》（內府本），〈論語集註序說〉，頁 778。

逢源、劉成群和朱冶都從不同方面分析了《大全》取材偏重元代新安學術的原因；²⁸ 而陳逢源和孫廣指出《大全》也體現了對金華「北山學脈」的重視。²⁹ 而無論其淵源何自，《大全》頒行之後，其中「小注」即作為顧永新所言的「三次文獻」，與「四書」經文和朱熹「大注」一併成為官方認可的權威。

《大全》「小注」的權威性，可從明代的孔廟從祀制度中窺得一斑。正統十三年（1448）福建將樂儒學訓導王昌順請北宋大儒楊時從祀；弘治五年（1492）戶部左侍郎吳原又請南宋陳淳從祀，其主要理由皆包括《五經四書大全》多採其注解；³⁰ 弘治十七年（1504）監生魏浚請賜宋儒劉子翬祀於建安縣學；萬曆四十年（1612）福建巡撫又請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其理由亦包括《性理大全》採其著述。³¹ 而成化元年（1465），國子監助教李伸言元儒劉因曾與許衡、吳澄並稱，今不應獨不從祀；侍講學士劉定之則反對，言《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多採吳氏說而不採劉氏之說，因此劉因不應從祀。³² 雖然最終結果證明，是否載入《大全》並非禮部和皇帝決定從祀的唯一標準，³³ 但有明一代之士人表彰先儒時，以是否名列三部《大全》作為重要的評價標準，已經說明《大全》所採「小注」的地位。

又如嘉靖間人鄭曉所著《今言》，言洪武間科舉「《五經》皆主古註疏」，而「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³⁴ 也就是說，明代前中期有一種觀念，認為「五經」注疏之有價值者已悉數採入《大全》之「小注」，而《大全》未收的注疏文字則無價值。這同樣也說明了《大全》所採「小注」的權威地位。

²⁸ 陳逢源，〈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頁 96-104；劉成群，〈「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頁 64-68；朱冶，〈元明朱子學的遞嬗〉，頁 163-186。

²⁹ 陳逢源，〈「工夫」與「境界」〉，頁 56-64；孫廣，〈《四書大全》編纂考詳〉，頁 190-195。

³⁰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英宗實錄》卷一六三，頁 3166-3167；《孝宗實錄》卷六四，頁 1233。

³¹ 《明實錄》，《孝宗實錄》卷二一二，頁 3961-3962；《神宗實錄》卷四九二，頁 9262。

³²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二四，頁 474-478。

³³ 考《明史·禮志》，楊時弘治八年（1495）始從祀，陳淳似未嘗從祀，羅從彥、李侗則於萬曆間從祀，似即從福建之請。見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六，頁 1296-1301。劉子翬祀、劉因不從祀，則即從魏浚、劉定之之說。

³⁴ 鄭曉，《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一，頁 16。

王赫

總之，明成祖敕撰三部《大全》的目的即建立一整套新的經學權威，如其御製〈序〉所言，欲「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³⁵ 經學、理學歸於一統。

（二）「坊刻」《大全》對「官刻」的補充作用

無論是編纂《大全》來建立經學新權威，還是閱讀《大全》來研學或應試，都需要藉助刻書這一渠道來實現。因此明成祖深知將三部《大全》「命工鉅梓，頒布天下」的重要性，³⁶ 從永樂十五年（1417），即成書二年後「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于六部，併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開始，³⁷ 明朝皇帝不斷頒賜此書於兩京國子監，全國府、州、縣、衛學校，各藩王府，朝廷大臣以及朝鮮國王，頒賜的記錄多見於《明實錄》；嘉靖時還有重刻的記載。³⁸ 然而《實錄》從隆慶年間開始，就不再有皇帝頒賜《大全》的明確記錄。又晚明曾任司禮監丞的劉若愚於崇禎間撰〈內板經書記略〉，言彼時司禮監尚存三部《大全》書板；但他也提到自神宗靜攝，經筵塵封以來，司禮監清點、保存書板和圖書的職能就荒廢了，³⁹ 若然，則印刷之舉蓋亦廢弛。故或可推測，內府出版《大全》的行為主要在明初至明中葉嘉靖年間。此外，三部《大全》的書板至清初尚經修補利用。⁴⁰

現今全球各機構所藏《四書大全》內府刻本即「經廠本」很多，⁴¹ 此種內府

³⁵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六八，頁 1874。

³⁶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六八，頁 1874。

³⁷ 《明實錄》，《太宗實錄》卷一八六，頁 1990。

³⁸ 嘉靖時依然重視《大全》：嘉靖十五年（1536）實錄記載世宗曾命重抄「『四書』『五經』『二十一史』『性理大全』」等書，且其中「『書』『經』『史』各仍刊版一副」；二十二年（1543）載「錄《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進藏皇史宬」及「《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成」，二十四年（1545）載「以恭錄……《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二十一史』諸書成」而行賞。見《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一八七，頁 3951；卷二七三，頁 5372；卷二七四，頁 5380；卷二九四，頁 5626。

³⁹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一八，頁 157-159。

⁴⁰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229-231。

⁴¹ 唯其著錄卷數有異，因為「四書」各自獨立分卷，《大學》《中庸》之《章句大全》各 1 卷，《論語集註大全》20 卷，《孟子集註大全》14 卷；於此 36 卷之外還有《學》《庸》《論孟》之〈讀法〉各 1 卷、《學》《庸》之《或問》各 1 卷、《論》《孟》之〈集註序說〉各 1 卷，各地收藏的版本於這 7 種附錄或有闕漏，或計法不同，所以今各地所編藏書目錄最少著錄 36 卷，最多著錄 43 卷，而以著錄 43 卷為常見（43 卷尚不包括〈大學章句序〉及〈中庸章句序〉）。

刻本開本碩大，板框尺寸約 26×18 公分，半葉 10 行，行 22 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上下大黑口，雙對黑魚尾（見圖一），是典型的內府刻書風貌。

然而，在兩直十三省廣大士人的書齋中，內府刻本絕非占據一統天下的地位；形形色色的坊刻本占據了相當可觀的位置，即使是在皇帝頻頻頒賜官本的明前中期也是如此。容易想見，即使是最接近普通士人層次的地方學校，朝廷所頒之書縱使入藏也必定不多，並非人人可輕易取閱，更何況校外人士。因此內府刻本在最廣大士人中的流行程度必定受限。為具體探討《四書大全》內府本和坊刻本在明代士人閱讀中的流行情況，可以先從藏書目錄入手考察。今存明清時期著錄版本的書目雖不多，但亦可於其中窺得一斑：如明中葉《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錄的《四書大全》，即有「內府刻一部、閩刻一部」，《五經大全》亦皆有「閩刻」，其中《禮記大全》僅有「閩刻」；⁴²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亦著錄「內府版《五經四書大全》、坊版《五經四書大全》」各一部。⁴³ 下文將揭，所謂「閩刻」本無論是否有官方背景，均由商業性書坊刊刻，且內容並不與官本原書完全一致。此外，清及近代目錄著錄的明刻《五經大全》版本信息較《四書大全》為多，考察可見其中亦多坊本，且常與內府本混雜，如徐炳義《培林堂書目》「《周易大全》」條下別出「又內板《大全》」一條；陳世溶《問源樓書目》「《周易大全》」著錄「明刊大字本」與「明刊小字本」，小字者即坊本；許槿《古韻閣書目》所著錄《五經大全》四種中僅《春秋大全》一種為「經廠本」；林集虛《目觀天一閣書錄》所著錄《五經大全》僅有兩種，均為建陽坊本。⁴⁴ 據此，《四書大全》的情況亦可推想。就連明代南京國子監也不免受坊刻本《大全》影響：嘉靖間黃佐纂修的《南雍志·經籍志》記載，天順時南監存內府本《四書大全》六部，至修志時欲尋完整的一部已不可得，而又多出「福建板《孟

⁴² 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7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明抄本影印），頁 7, 10, 12, 15, 18。

⁴³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12 冊，據黃永年藏清初抄本影印），頁 3。

⁴⁴ 徐炳義，《培林堂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19 冊，據民國四年鉛印二徐書目合刻本影印），卷一，頁 8；陳世溶，《問源樓書目初編》（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26-27 冊，據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一上，頁 477；許槿，《許氏古韻閣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29 冊，據國家圖書館藏清許氏古韻閣抄本影印），卷一，頁 379；林集虛，《目觀天一閣書錄》（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5 冊，據黎照廬木活字排印本影印），卷一，頁 117, 125。

王赫

子大全》一部」；《禮記大全》亦多出「福建板二部」。⁴⁵ 國學尚如此，南方書業發達地區的學校情況亦可推想。而如果以今日藏書目錄為視角，考察《中國古籍總目》，明確著錄為內府刻本的《四書大全》有 22 家機構收藏；而明確著錄為坊刻本的《四書大全》亦有 17 家機構收藏。⁴⁶ 綜上所述，再考慮到近代以來藏家長期輕視坊刻科舉用書，故坊刻《大全》較難保存的情況，若說明代坊刻本《大全》對士人的影響力不在內府刻本之下，當非無據。

侯美珍曾援引永樂及宣德、正統時期士人之語，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頒之學宮，士未能盡見」，這表明彼時《大全》系列書籍因藏在學校而不利於傳播；⁴⁷ 而建陽坊刻本《大全》正是針對這一問題而誕生：從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坊主葉景遠從學校抄錄《四書性理大全》以刊刻發行開始，建陽書坊刊刻《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者真如雨後春筍。今僅據有限範圍內的統計，明代坊刻《四書大全》共有 30 個出版者較明確的版本可考（見附表一），實際情況當不止此，其刊印不可謂不頻繁。同時，坊刻「五經」之《大全》，亦共有 55 個版本可考（見附表二）。考慮到「天下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的行銷能力和市場規模，⁴⁸《大全》被一版再版的事實足以說明其流行，也足以使《大全》「藏於學校，閭巷未易得睹」⁴⁹ 的情況得到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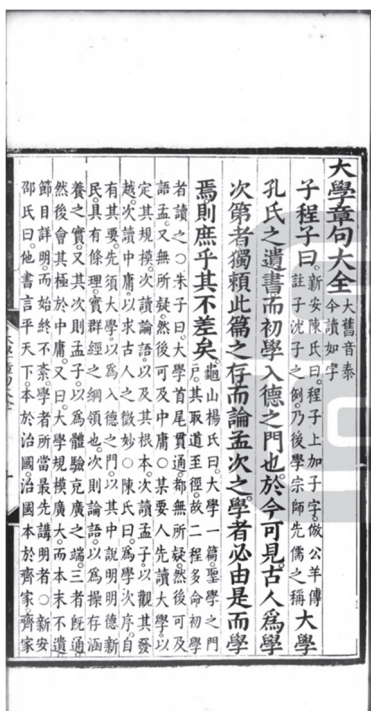
⁴⁵ 黃佐，《南廡志》（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 412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朱絲欄鈔本影印），卷一七，頁 546。

⁴⁶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 經部》（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 2 冊，頁 860-861。按：每機構未必僅藏一部，而每部未必皆全帙，但《總目》於此類信息往往闕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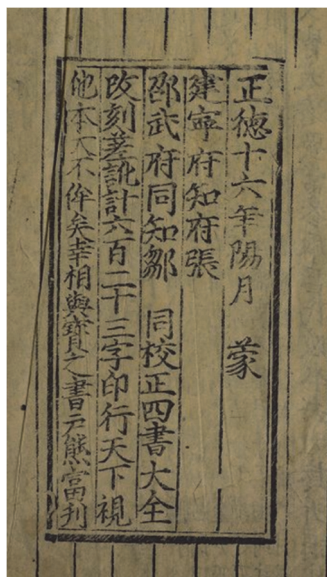
⁴⁷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中國文化研究》2016.2：32-33。

⁴⁸ 蔡清，《蔡文莊公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卷八附錄，〈奏刊《易經蒙引》堪合〉，頁 218；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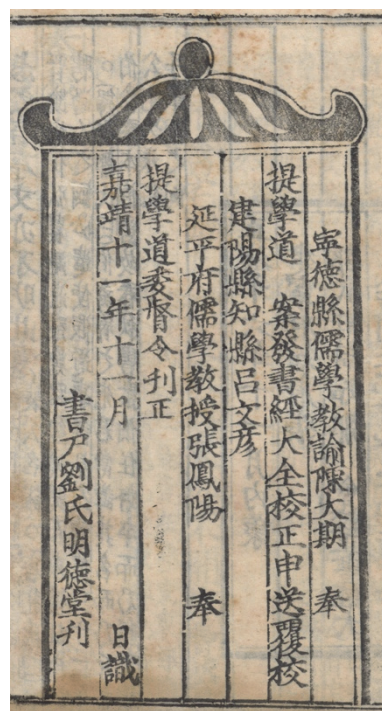
⁴⁹ 轉引自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 33。



圖一：《四書大全》明內府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二：正德間熊富刻《四書大全》牌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圖三：嘉靖間書戶劉氏明德堂刻本《書經大全》末葉牌記（南京圖書館藏）

（三）坊刻《大全》與官方的關係

《四書大全》以及《五經大全》的坊刻本是怎樣產生的？這涉及明代官修書與書坊（特別是建陽書坊）的密切關係。因為《大全》發行量大，翻刻者多，因此建陽坊刻《大全》與官方的關係有三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書坊單純地翻刻官本《大全》以謀利，與官方無關，此為最常見的情況。今見書坊最早刊刻《大全》之記錄，是宣德二年（1427）建陽葉景遠所為，《大全》主要編纂者之一楊榮（1372-1440）曾為此本作〈恭題四書性

王赫

理大全後》。⁵⁰ 葉氏三峰書舍是明前期建陽大書坊，而楊氏與葉氏有交誼。⁵¹ 楊氏別集中此跋不署年月，而今考各坊刻本所載楊榮〈書後〉均落款宣德二年七月，⁵² 則《四書大全》成書僅 12 年後，內府刻本頒行全國僅 10 年後，建陽書坊就開始刊行，可見建陽書坊對舉業用書商機的嗅覺之敏銳。

第二種情況，則是書坊假託官員之名義刻書。如晚明「芝城建邑書林余氏」刊刻了全套《四書五經大全》，除《春秋》外全部假託名公校正：《申學士校正書經大全》託名申時行（1535-1614），《葉太史參補詩經大全》託名葉向高（1559-1627），《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託名張瑞圖（1570-1644），《李太史參補四書大全》託名李廷機（1542-1616），此四人均是朝廷鉅手；而《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以及《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所託名之周士顯（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則名氣遠遜，卻是余氏之真相識。周氏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上任建陽知縣，於政暇在書院課士，且訪求朱熹和真德秀後裔，建其祠田，可見其頗尊朱子學；且他曾託余彰德、余象斗刊行其《古今韻會小補》一書，由此可見他與建陽書林的密切關係。⁵³

第三種情況，則是官方出於實際需要，主動委託書坊刻印。如嘉靖《建陽縣志》記載，嘉靖間建陽縣學整理藏書後，因內府刻本《四書五經大全》「冊褻重大，不便檢閱」，又「依數再製書坊刊本」以供使用，⁵⁴ 主此事者當即學官。當

⁵⁰ 楊榮，《文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一五，頁 237。

⁵¹ 閻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頁 40-42。

⁵²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成化三年劉氏翠巖精舍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首，〈題四書大全書後〉，頁 2b；胡廣等，《四書大全》（晚明德壽堂刻本，開封：開封市圖書館藏），卷末，〈題四書大全書後〉，頁 2b；胡廣等纂修，題周士顯校正，《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翻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明末映旭齋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首，〈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頁 2b。其餘同者多，不具引。

⁵³ 張尊德修，王吉人、譚篆纂，康熙《安陸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4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1，據固學齋鈔本影印），卷二二，頁 385-386；方彥壽，《福建歷代刻書家考略》（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361-362；賈晉珠著，邱葵、鄒秀英、柳穎、劉倩譯，李國慶校，《謀利而印：11 至 17 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頁 227-228。

⁵⁴ 馮繼科、閻橋纂修，嘉靖《建陽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41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五，頁 19b-20a。

時所託何家書坊今已無考；然而此舉既為解決內府本「冊褻重大」的不便，其所製坊刻本必為小本小字的形式，與下文所論明前中期諸家建本《大全》的格式一致。

此外，正德、嘉靖間多家書坊所刻《四書五經大全》均有標榜「建寧府知府張、邵武府同知鄒同校正（或作「會校正」）……改刻差訛」牌記，除書名、刊刻者、年月及改正字數有異外，文字及格式均同（見圖二、表一）。而觀同一牌記中校正時間與刊刻時間之異，蓋①②⑤為正德末嘉靖初原刻本，③④與⑥則分別翻刻②與⑤，故將牌記一併翻刻。值得注意的是，格式相同的牌記也出現在建陽「書戶劉洪」（劉弘毅）慎獨齋所刻《山堂考索》《文獻通考》《禮記集說》《史記》四書中，已為書籍史家所注意。李子歸認為這些牌記中所署「書戶」是一種役戶，刻書工作是一種特殊徭役。⁵⁵ 金文京則認為知府與同知不太可能親自校書，這一官方認證當僅出於劉洪的請託。⁵⁶ 然而據本文所搜羅的《大全》版本，可見這一牌記不僅出現在慎獨齋所刻書中，亦出現在正德末嘉靖初其他多家「書戶」或書坊刊刻的《四書五經大全》中。故彼時「建寧府知府張（文麟）、邵武府同知鄒（武）」作為「校正」者廣泛地出現在建陽坊本中，蓋非僅出於個別書坊主之請託。⁵⁷ 雖然張、鄒二人不可能親自校書，但亦可主其事而署其名。此外，閩春所見天順二年刻本《中庸大全》一卷卷末牌記云「福建憲司提督學校僉事游明大昇校正原本重複刊行」，⁵⁸ 情況或與張、鄒二氏類似。

⁵⁵ 李子歸，〈明代建陽的書戶與書坊〉，頁 31-36。

⁵⁶ 金文京，〈明代建陽の商業出版と通俗小説〉，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日中韓をめぐる本の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2021），頁 745。

⁵⁷ 當然，也存在這種可能：有此牌記的《四書五經大全》亦皆劉弘毅慎獨齋初刻，此後建本《大全》有此牌記者皆從此本翻出。

⁵⁸ 閩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頁 26-28, 39-44。此書今上海圖書館已不能提供。

表一：今見建本《四書五經大全》牌記題
「建寧府知府張、邵武府同知鄒」校正例⁵⁹

編號	書名	書戶或書坊	題校正時間	(同一牌記內) 題刊刻時間	號稱 改正 字數
①	四書大全	書戶熊富刊	正德十六年 (1521) 陽月	未單獨提及	623
②	書經大全	書戶劉氏重刊	正德十六年 (1521) 十一月	嘉靖元年 (1522) 季秋月	900
③	書經大全	明德堂重刊	正德十六年 (1521) 十一月	嘉靖十一年 (1532) 季冬月	900
④	書經大全	書戶葉氏重刊	正德十六年 (1521) 十一月	嘉靖十五年 (1536) 春月	900
⑤	詩經大全	書戶劉輝刊	嘉靖元年 (1522) 十月	未單獨提及	450
⑥	詩經大全	宗文堂刊	嘉靖元年 (1522) 十月	戊申年 (1548) 孟冬	450

即使上述張、鄒「校正」之例確為諸書坊託名之伎倆，也有其他實例可見官方確曾積極參與建陽《四書五經大全》的坊刻。嘉靖十一年 (1532) 十二月，福建按察使司下牒文糾正「五經四書」坊本之謬，規定了各經須刻之傳注，如《易》刻程傳、《本義》，《春秋》刻胡傳而附以三傳，並要求「拘各刻書匠戶到官，每給一部，嚴督務要照式翻刊，縣仍選委師生對同，方許刷賣。書尾就刻匠戶姓名查攷」，⁶⁰ 此事亦為書籍史家所熟知。而就在此牒所署日期之前一月，劉氏明德堂與劉氏安正堂都在《書經大全》的末尾添加牌記云：「寧德縣儒學教諭陳大期奉提學道案發《書經大全》校正，申送覆校，建陽縣知縣呂文彥、延平

⁵⁹ 熊富刻本《四書大全》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明德堂刻本《書經大全》乃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表中其他信息見「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79860694>)；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321；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第 2 冊，頁 76-77。

⁶⁰ 葉德輝，《書林清話 附書林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七，頁 179。

府儒學教授張鳳陽奉提學道委督令刊正」，⁶¹ 並均題「書戶某氏」（見圖三）。此書雖為《書經大全》而非上述牒文所論的《書經》蔡傳，但完全符合上述牒文的審查要求。當然，今可考官方的審查規模，遠不能涵蓋坊間的全部刊印出版活動，晚明尤其如此。

（四）估測坊刻本《大全》的售價

坊刻《四書大全》及《五經大全》的售價如何？周啟榮曾推測十七世紀初的規模化商業出版中，刊刻一塊書板之一面（即刷印一個筒子葉所用）的成本蓋不超過 0.1 兩；⁶² 又引及萬曆三十六年（1608）杭州為修建祠堂所刻的一種小冊子，其刊刻一個筒子葉的平均成本為 0.07 兩，印數為 580 部（20 部綿紙，其餘為竹紙），而紙墨、刷印與裝訂的總成本約為刊刻成本的 3 倍。而在利潤率方面，周氏舉出清初安徽湯復刻本《離騷圖》的利潤率為 100%。⁶³ 據此二例中之數據，不妨估測晚明《四書五經大全》平均每個筒子葉的刊刻成本即 0.1 兩，用竹紙刷印 600 部——對這種基本書籍來說，這一印數蓋非高估，且下文將揭明代《大全》的板片利用率很高——紙墨、刷印與裝訂的總成本為刊刻成本的 3 倍，則成書平均每葉的總成本約 0.0007 兩；若按 100% 的利潤出售，則平均每葉售價約 0.0014 兩。如此，一部萬曆後期建陽余氏刻本《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售價約 2.6 兩，余刻《五經大全》中卷帙最寡的《申學士校正書經大全》約 1.1 兩，最多的《春秋集傳大全》約 2.2 兩；而在江南地區，一部蘇州刻八行本《四書大全》售價則約 2.7 兩。⁶⁴ 若暫且允許將這一單價套用到明中葉，則一部明弘治劉氏慶源書堂刻本《四書大全》售價約 1.9 兩，明中葉劉氏安正書堂重印王氏善敬書堂刻本《書經大全》約 1.0 兩，明隆慶鄭氏宗文書堂刻本《春秋集傳大全》約 1.9 兩。⁶⁵

⁶¹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 2 冊，頁 71；「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79860694>）（牌記有殘闕）。

⁶²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38, 45-46.

⁶³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45-46.

⁶⁴ 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晚明書林余氏刻本《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共 1,834 葉；《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共 798 葉；《春秋集傳大全》共 1,540 葉；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末詩瘦閣刻吳門德馨堂印本《四書大全》共 1,956 葉。

⁶⁵ 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劉氏慶源書堂刻本《四書大全》共 1,353 葉（闕葉據字數推算後計入）；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中葉王氏善敬書堂刻劉氏安正書堂印本《書經大全》共 705 葉；明隆慶鄭氏宗文書堂刻本《春秋大全》共 1,326 葉。

在上述估算的基礎上，崇禎間張溥（1602-1641）綜合《大全》與《註疏》二書編纂而成的《註疏大全合纂》系列書籍可藉以參考來修正結論：今見明末張衡印本《四書註疏大全合纂》一部三十六卷，定價為 3 兩，⁶⁶ 平均每葉單價為 0.0015 兩；則同時行款與之相似的一部蘇州刻本《四書大全》，按此單價計算定價約 2.9 兩，⁶⁷ 略高於前估算所得數值。又見張衡重印崑山李可衡刻本《易經註疏大全合纂》一部六十八卷，葉數較少，但售價亦為 3 兩，⁶⁸ 與《四書註疏大全合纂》相同，或許是因為在明代科舉中「一經」與「四書」在形式上有相同的地位。若《大全》的銷售中也有類似的現象，則卷帙較少的《書經大全》等售價抑或不如前所估算的那樣低。當然，同樣要考慮到晚明江南（尤其是蘇州等地）的物價偏高，書價亦然；而建本因為規模效應強、紙墨成本低、多用簡化字，其定價蓋低於江南刻本。

綜上，若推測在中晚明不同時段及不同地區，坊刻《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共六種中，每種的售價在 2-3 兩的範圍內浮動，卷帙較寡的《書經大全》等可能價格更廉，蓋無太大偏差。這一價位對應舉階級之多數人來說不難承受：例如上述張溥的《註疏大全合纂》系列曾經反覆刷印，⁶⁹ 說明此類科舉所用的基本書籍在當時有可觀的市場。

（五）《大全》在科舉中實際的地位與作用

三部《大全》由皇權認證，其權威性毋庸置疑；然而它們在科舉中實際的地位與作用如何？昔人多籠統地稱其「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等；⁷⁰ 但侯美珍敏銳地指出，《大全》雖曾對科舉產生過重要影響，然而其頒布未久時，約在正統後，科場已逐漸改尊程朱等傳注（即「大注」），而用「小注」者，或被視為

⁶⁶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廣西壯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廣西壯族自治區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6-7。此書內封面鈐朱文方印「每部紋銀叁兩」。此書今存不全，計同書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共 2,028 葉。

⁶⁷ 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末詩瘦閣刻吳門德馨堂印本《四書大全》共 1,956 葉。

⁶⁸ 天津：天津圖書館藏本，共 1,646 葉。內封面亦鈐朱文方印「每部紋銀叁兩」。

⁶⁹ 天津：天津圖書館藏《易經註疏大全合纂》內封面鐫「崑山李府藏□」，但又鈐「張衡藏板，不許翻刻」方印，說明李氏所刻書板轉讓於張氏。此外《四書註疏大全合纂》《易經註疏大全合纂》又有吳門寶翰樓印本，見笠井直美，〈吳郡寶翰樓書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64（2013）：302, 309-310。

⁷⁰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頁 301。

異說而遭黜落。⁷¹ 侯氏之論可謂精當：實際上，從未見官方直接規定科舉用《大全》「小注」的記載，《大全》「小注」的地位，當然未可與「大注」軒輊。

雖然，亦不宜太過低估《大全》在明代科舉中的作用及其讀者規模。蓋以為明人二百年間尊信之而不變，墨守之而不疑，固屬不實；然而本文所論述之《大全》在明代一版再版的史實，即可從出版史的角度揭示它在明代始終有相當數量的讀者。畢竟，《大全》本包含了單註本的全部內容和權威文本；侯美珍也指出，「小注」雖有繁冗、齟齬之處，然而其多數自與「大注」吻合。即便不論其所採錄程朱後學諸說，僅計其從朱子《文集》《語錄》及《語類》中採錄的大量經說，就頗為實用。

且「四書」與「五經」的情況，又不宜一概而論。明代科舉對「四書」的重視超過「五經」，這在坊刻《大全》的文本中有鮮明的體現：雖然《四書大全》卷帙已重，晚明亦出現各種節本，然而如下文所揭，《四書大全》的全本在明代始終流行，且不但刪，更依原書體例續補，連篇累牘。即使在晚明萬曆以後，人們已頗言士子不讀《大全》時，⁷² 這種增補本《四書大全》亦在建陽、南京和蘇州分別誕生了新刻本，且被紛紛翻刻或翻印。可見，至少就《四書大全》而言，出版市場證明了相當規模的應舉者寧取其繁而不取其簡。總之，雖不宜誇大《四書大全》的地位，但亦應將其視為一種主流科舉用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為之濫觴」，⁷³ 而終明之世，是書本身也始終保持著可觀的影響力。

（六）《四書大全》的版本系統

統計筆者得知刊印信息較明確的各種坊刻本《四書大全》，宣德二年（1427）之刻蓋為首創，今考見存最早刻本則為天順二年（1458）建陽黃氏仁和堂所刻；直至明末，《大全》不斷有重刻、重印，時間幾跨二百年。筆者通過原書、微縮膠卷、數位影像及影印本等方式，閱覽源出建陽而流傳至南京、蘇州的《四書大全》坊刻本十餘種，已涵蓋各主要系統中的代表版本。在此基礎上，通過書目、書影及古籍交易記錄等信息補充其他版本，整理出明代《四書大全》主要版本表及版本系統圖（見附表一、附圖）。

⁷¹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 28-36。

⁷²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 29-30。

⁷³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頁 301。

王赫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坊刻本《大全》的文本內容始終不限於永樂內府原本，而是在內府本的基礎上或增補，或附刻，加入各種新舊內容。這些增加的內容不僅體現了編纂者的學術取向，更因《大全》作為坊刻科舉用書，而能夠說明其潛在的讀者的學術取向。此外，如前所述，三浦秀一與周啟榮曾考證張自烈前後兩版《四書大全辯》的出版始末；《四書大全辯》一書的崇禎刻本對《大全》原書多有辯駁，但因號稱尊崇此書而完整保留了《大全》原書的內容，故本文擬將此書放在整個明代坊刻《大全》的脈絡中進行考察。本文以下三節，即通過講述《四書大全》在明代坊刻中的命運，來發掘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的密切關係。

三·明前中期建本與劉刻的增補

建陽書坊出版「四書五經」類科舉用書的傳統，元代已經開始。顧永新曾詳考元代至明初《周易傳義》及「附錄」本、《詩集傳》《書集傳》之「音釋」本、《四書（章句集注）》之「章圖纂釋」與「輯釋」本等的刊刻情況，其中建陽書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⁷⁴ 而永樂間《大全》頒行後，建陽各坊自然轉而刊刻《大全》。

據筆者所取得的資料，自宣德二年（1427）葉景遠刻《四書大全》始，迄於萬曆十三年（1585）王智泉刻《詩經大全》，在這一時段內，建陽書坊出版有「四書」或「五經」《大全》的「書戶」與書坊多達 20 餘家，其所刻《大全》風格相對劃一，皆沿元建本「四書五經」類書籍小板小字、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多簡化字的舊式，《四書大全》除一種九行本特例外，均半葉 12 行，《五經大全》多為 11 行（見附表一、附表二）。而以嘉靖間為明顯的轉折點，一些建本《大全》體現出新面貌：一是板框縮小，多個版本的框高由此前建本的 20 公分左右壓縮至 17 公分左右，如嘉靖間仁實堂本《四書大全》相比天順間仁和堂本板框降低了 5 公分（見附表三）；二是受當時江南刻書風貌影響，出現了白口與「方體字」，嘉靖後期安正堂所刻《禮記集說大全》即為顯例，字體已與明前期建本《大全》差異很大，但行款依然同前期建本。⁷⁵

⁷⁴ 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頁 314-376, 501-529。

⁷⁵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 4 冊，頁 56。

總之，此時段內諸家發行的《大全》書本同質化明顯，重刻、重印與板片交易蔚然成風：如劉氏安正堂時隔 10 年重印《書經大全》，時隔 30 年重刻《禮記大全》，又得板重印王氏善敬堂所刻《書經大全》；又如安正堂曾時隔 2 年再版《春秋大全》，楊氏清江書堂時隔 8 年再版《周易大全》，或即舊板重印；而劉氏翠巖精舍時隔 16 年再版《四書大全》，余氏雙桂書堂時隔 56 年再版《周易大全》，蓋乃重刻新板。要之建陽書坊對刊印《大全》的熱衷，足以證明其書之流行；而《四書大全》尤甚。

（一）建陽十二行本的興盛

如上節所述，最早推出《四書大全》坊刻本的是宣德間建陽葉景達；而今可見最早的建陽刻本則為天順二年（1458）黃氏仁和堂刻本（見圖四），⁷⁶ 此外筆者所見，有成化三年（1467）劉氏翠巖精舍刻本、弘治八年（1495）熊氏種德堂刻本（見圖五）、⁷⁷ 弘治十四年（1501）劉氏慶源書堂刻本，⁷⁸ 以及正德十六年（1521）書戶熊富刻本，⁷⁹ 其中慶源書堂本基本為完帙。筆者未得親見這一系統的嘉靖刻本，今可考有嘉靖八年（1529）余氏雙桂堂刻本等，而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槐書堂刻本時代最晚（見附表一）。劉氏翠巖精舍與余氏雙桂堂都是元代已有的書坊，種德堂為明初熊宗立創立並發揚光大，⁸⁰ 它們都刻有不少科舉用書。

今見出版者可考的建陽十二行本《大全》，版式、行款均一致，內容也基本相同（其小異如刪存劉刻按語，詳下文），蓋即以宣德二年葉景達刻本為祖本，轉相翻刻而成。又如上所述，嘉靖建本《四書大全》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板框縮小、字體改變。總之，建本在物質形態方面與內府刻本的最明顯區別就是縮小開本，以彌補內府本「冊褻重大，不便檢閱」的缺陷。

因《四書大全》乃朝廷所頒，亦並非時人新著，故各家可自由翻刻，全不見其牌記、題識中出現禁止翻刻的字眼。今見劉氏慶源書堂本的牌記原樣翻刻熊氏種德堂本，僅更改時間和堂號（見圖六），慶源書堂還順帶翻刻了同時期詹氏進

⁷⁶ 筆者所見為杭州：浙江圖書館藏本。

⁷⁷ 二書均為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

⁷⁸ 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本。

⁷⁹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本。

⁸⁰ 方彥壽，《福建歷代刻書家考略》，頁 250-251, 268-270, 329, 338-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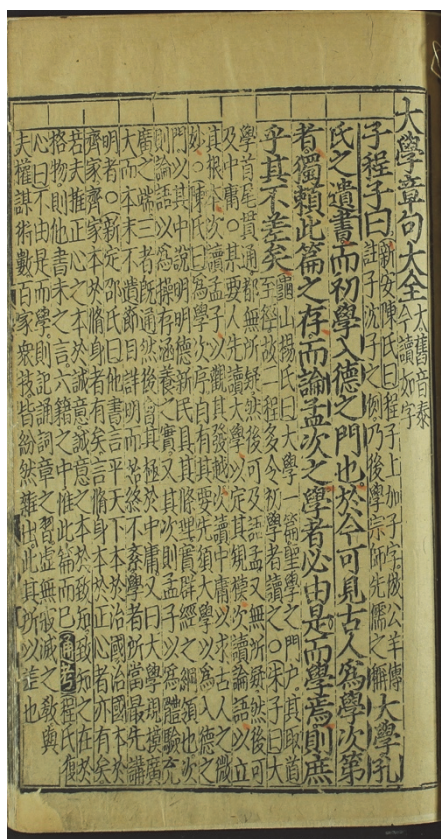
王赫

德書堂的「三峰精舍」牌記，改為「瑞樟精舍」（見圖七）。⁸¹ 凡此種種，都是建陽書坊的慣常做法。從明中葉劉氏安正堂所出版《書經大全》保留王氏善敬書堂牌記之例，⁸² 可見《大全》系列板片在建陽書坊內的流通。雖然筆者未見《四書大全》的例證，但板片交易亦很可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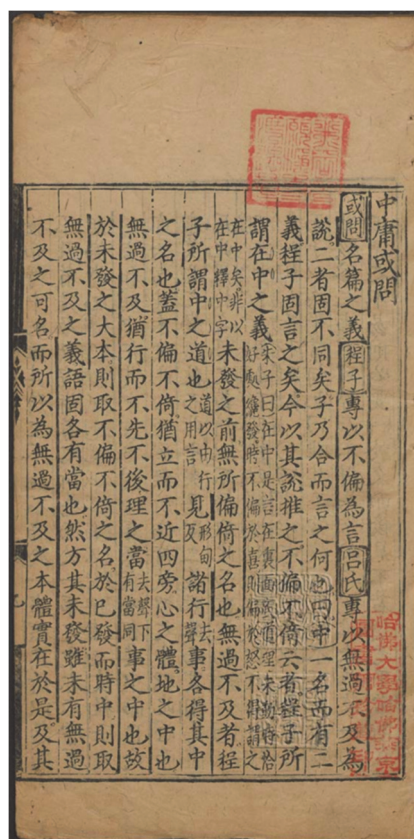
建陽坊刻舉業用書的特點，還在文本的形式上體現出來。它們將小注中之名氏如「新安陳氏曰」「龜山楊氏曰」「朱子曰」等圈出（見圖四、圖五），凡此即為在內府刻本於每條小注加圈（見圖一）的基礎上進一步區分小注，更加方便閱讀；又時於大注中「程子」「呂氏」等姓氏用方框框出，同樣是方便區分各家觀點（見圖五）。而於大注中的關鍵字句還加以圈、點或抹，亦是指示初學閱讀重點的坊刻舉業用書習氣。至於訛誤甚多，亦此類書籍中在所不免的現象。

⁸¹ 參見方彥壽，《增訂建陽刻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頁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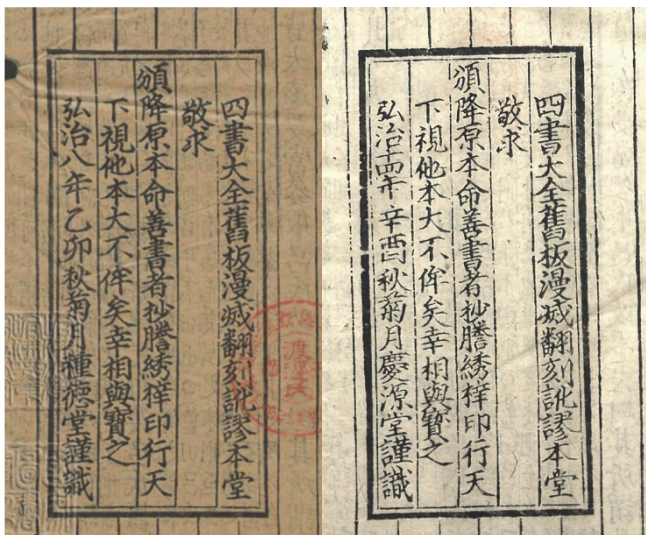
⁸² 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林羅山批校本。



圖四：《四書大全》明天順間黃氏仁和堂刻本（浙江圖書館藏）



圖五：《四書大全》明弘治間熊氏種德堂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圖六：弘治間熊氏種德堂、劉氏慶源書堂刻《四書大全》牌記（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南京圖書館藏）



圖七：弘治間劉氏慶源書堂刻《四書大全》牌記（南京圖書館藏）

此外，筆者尚見一種特殊的十二行本《四書大全》，其版式、字體與上述嘉靖間新出現的白口「方體字」建本《禮記集說大全》一例，而版心題「正譌四書大全」，每行字數則多至 25 字。⁸³ 又有一種九行本《四書大全》，⁸⁴ 其版式、字體、板框尺寸等外觀皆與明初以來傳統建本《四書大全》一例，更有訛字相同處；而其行款疏朗，故雖板框窄小，卷帙卻較內府刻本增多，頗不似典型建陽坊本。上文曾論及嘉靖間建陽縣學委託書坊刻書供學校使用，此本或出於這類情況。二本均有劉刻所增補內容（詳下文），蓋均出於上述明前中期建本。此二本因皆僅見孤本，故暫附之於此，以俟後考。

⁸³ 「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63462196/>；<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65462234/>)。經文、大注皆行 25 字，小注小字雙行同。

⁸⁴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建陽刻本。板框尺寸為 19.7×12.9 公分。經文行 17 字，大注行 18 字、小注小字雙行同。

（二）建陽劉剡對《大全》的增補

這十餘家建陽書坊對《四書大全》的處理，遠遠不止勾畫點抹而已：他們雖然聲稱自己所刻《四書大全》來源於「頒降原本」，但事實上對原書進行了頗為可觀的增補，即在原來的每節小注之後增加了「通考」「附纂」和「通旨」三部分內容，共計 700 餘條；若分別細計其中各家之說，則達上千條。明前中期建本《四書大全》之所以半葉行數與每行字數皆多於《五經大全》（見附表三），蓋即因增補了內容，故欲節省卷帙。

「通考」「附纂」或「通旨」等二字以建陽書坊慣用的墨蓋子陰文形式標出（見圖四）。《學》《庸》部分增補內容最多，《論》《孟》則較少。以弘治間慶源書堂本計，《大學》部分共增入 136 條，《中庸》部分共增入 171 條，且《學》《庸》所增條目往往有數百上千言者；而篇幅數倍於《學》《庸》的《論語》部分僅增入 224 條，《孟子》部分僅增入 231 條，相比《學》《庸》明顯減少。

這些增補的「通考」等內容出自誰手？考萬曆刻本《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綱目》卷一六云「劉琰，字用章，建陽人……以《四書大全》加入《通考》行於世」，⁸⁵ 則知其人乃明初出身建陽書林的學者劉剡（琰字誤）。又見弘治本《大學大全》中「通考」文末有「劉剡按」云云，《中庸大全》中二條「通考」文末均有「剡按」云云，則更無疑。⁸⁶ 考察筆者所能看到的早期刻本，最早的天順本《大學大全》亦有劉剡按語，⁸⁷ 成化本卻無此條，並無《中庸大全》中的首條「剡按」，此當是翻刻時所刪，非出自劉氏更定。因為劉剡所處的時代更早：他於永樂初年已成名，七十歲卒，主要生活在洪武到正統年間。作為大書坊主翠巖精舍劉君佐之後，他既為書林校書，又自己著書、刻書。⁸⁸ 劉氏從叔祖劉叔簡曾

⁸⁵ 周尚文校閱，《新刻京本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綱目》（明萬曆刻本，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卷一六，頁 14b。

⁸⁶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弘治十四年劉氏慶源書堂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大學章句大全》，頁 10a，《中庸章句大全》，頁 4a, 23b；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弘治八年熊氏種德堂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庸章句大全》，頁 4a, 23b。按，下文引用、統計劉剡本《大全》內容而不別加說明時均據慶源書堂本，引用時注明「（劉剡本）」。

⁸⁷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天順二年黃氏仁和堂刻本，杭州：浙江圖書館藏），《大學章句大全》，頁 10a；此本《中庸章句大全》今不存，故無法考察。

⁸⁸ 謝水順、李琨，《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262-264；方彥壽，《福建歷代刻書家考略》，頁 329-330。

刊刻元代倪士毅《四書輯釋》，劉剡於正統初年又參與刊刻了王逢《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⁸⁹ 於此可窺見劉氏增補《四書大全》的學術背景之一斑，也可見建陽書坊編纂、刊刻「四書」之纂疏類講章的傳統之悠久。

劉剡增入《大全》的條目以「通考」為主，「附纂」和「通旨」則較少。「附纂」主要錄黃寬說，但也有別家說，「通旨」則全為朱公遷說；但黃氏和朱氏之說也經常出現在「通考」中，可見三者出於一手，標目比較隨意。根據這三個名目和今存文獻，可考劉剡增補《大全》時主要取材於至少五種書籍：

- (1) 元末明初王元善《四書輯釋通攷》，今存。元善，福建莆田人，此書是倪士毅《四書輯釋》的增補本，⁹⁰ 在倪士毅《四書輯釋》的基礎上續補諸家之說，間下己意。劉剡所設「通考」之目即由此書而來，故取材此書甚多，取宋代趙德和元代許謙（1269-1337）、金履祥、吳程、程復心、熊禾（1253-1312）之說為多，其中熊氏、許氏與金氏亦在《大全》原本所收諸家之內。
- (2) 宋黃寬《四書附纂》，今佚。寬字洵饒，福建福鼎人。⁹¹ 此書已佚，而據「附纂」多引「黃氏洵饒曰」，知其內容當出此書。
- (3) 元朱公遷（至正元年舉人）《四書通旨》，今存。⁹² 公遷字克升，江西樂平人。⁹³ 「通旨」所引「朱氏公遷曰」即出此書。
- (4) 宋吳季子《大學講義》，今佚。季子字節卿，福建邵武人，其《大學講義》二卷晚明尚存，今佚。⁹⁴ 而劉剡本《大學大全》增補「吳氏季子曰」45 條，乃典型「講義」文體，當即此書。

⁸⁹ 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頁 514-520。《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今存明正統詹氏進德書堂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四十卷。

⁹⁰ 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頁 514；佐野公治，《四書學史的研究》，頁 214-224。《通攷》今存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永樂四年博雅書堂刻本，存《論語》四卷首一卷；又有與元程復心《章圖》合刻本，四十三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初刻本影印。

⁹¹ 黃宗義原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六四，頁 2083。

⁹² 有《通志堂經解》本，六卷。見朱公遷，《四書通旨》（收入納蘭性德輯，《通志堂經解》，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 16 冊）。

⁹³ 黃宗義，《宋元學案》卷八三，頁 2826-2829。

⁹⁴ 陳道、黃仲昭纂修，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7-17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影印），卷七〇，頁 559；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8 冊，據清乾隆六十年長塘鮑氏刻本影印），卷上，頁 249。

(5) 元史伯璿 (1299-1354)《四書管窺》，今存。⁹⁵ 伯璿字文璣，浙江平陽人。⁹⁶

劉氏所增補「史氏伯璿曰」以《中庸大全》最為集中，一卷中即有 85 條。

可見，其增補內容絕大多數是宋元經說，與《大全》原書小注同質。在具體的地域或學派考量方面，唯一明顯的特點就是多取材於福建學者。這對建陽劉剡來說非常正常，何況倪氏《輯釋》與王氏《通攷》本來就以建本形態存在。

今見最早的劉剡增補本《大全》刻於天順二年 (1458)，此時他應已故或垂暮，增補《大全》之舉當早於此，天順本之前很可能有更早的刻本；又可知正統五年 (1440) 劉剡曾與葉景遠有過合作。⁹⁷ 因此，宣德二年 (1427) 葉氏刊刻的《四書大全》，很可能就是劉剡增補本，也就是說，《大全》很可能在坊刻之始就已非原來面貌。

(三) 揣摩字句與制藝風習

王元善《通攷》屬前述「纂疏」之體，與《輯釋》《大全》一致。而劉剡所採黃寬《附纂》之說大多簡短，蓋「附纂」即為纂疏類著作再附一家，惜已難詳考。朱公遷《通旨》體例獨特，摘「四書」內容按類相從編為九十八門，每門中於每組內容相關的經文下作講解。至於吳氏《講義》不務訓詁而重視發揮義理，顯然是宋代講學之產物；而其內容淺俗，講究對偶、用事、辭藻，則與元鄒次陳 (至元十一年？進士)《書義斷法》類似；⁹⁸ 史氏《管窺》則與歐陽修《詩本義》之「論曰」相似，不出白文，僅條例宋元先儒之說，後下按語辯論之：此二書行文繁複，故增補者割裂二書添入《大全》時造成了喧賓奪主之勢，往往一條成百上千言，與官本《大全》之體例實不相侔。

無論體裁有何區別，劉剡將這些宋元儒之說屢入官本《大全》，自然有供讀者博覽以資舉業弋獲的目的。而這些總體上篇幅可觀的「通考」「附纂」或「通旨」，相比《大全》原書，或在揣摩字義章旨、闡發前後關聯方面更加詳細具體，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一節，

⁹⁵ 有《四庫全書》本，八卷。見史伯璿，《四書管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4 冊)。

⁹⁶ 黃宗義，《宋元學案》卷六五，頁 2116。

⁹⁷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頁 262-263。

⁹⁸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頁 98。

王赫

《大全》小注原文僅細繹「性」「教」二字，劉刻所補「通考」則引「東陽許氏曰」細繹「誠」「明」乃至「則」字：

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明」字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⁹⁹

以後世眼光看，如此揣摩字義囉嗦穿鑿；然而劉刻將此類經說增補入《大全》，正可見當日科舉經學的特點：蓋既逐字講明「誠明」及「明誠」二意之異同，即易據此敷演出上下比偶的制藝文章。又如《中庸》第三十二章後小注引數條「史氏伯璿曰」共計二千餘言，即詳細闡明《中庸》第二十一至三十二章作為一個整體的大旨及前後聯繫。¹⁰⁰

而增補朱氏《通旨》內容中，則多有勾連「四書」，發凡起例者，如《論語大全》首章「通考」引「朱氏公遷曰」：

「四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此章「不知不愠」……以德言，為成德之稱，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脩己以敬」……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侍於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¹⁰¹

這種類書式的方法，極方便初學理解、記憶。

另外的一些增補內容則擅長推廣經義、廣泛勾連「四書」「五經」，如吳季子《講義》多然；經書內部的相關事例，是作經義文章最常援引的基本典故。且吳氏講義具有文學性，已如元代講章、程墨般語多偶麗，故有遙契明代制藝文體者，如《大學大全》「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節「通考」引吳氏云：

⁹⁹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中庸章句大全》，頁81a。

¹⁰⁰ 此處弘治慶源書堂本闕，見胡廣等纂修，題周士顯校正，《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翻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明末留畊堂周譽吾印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卷一七，頁154b-158a。本條取自史氏《四書管窺》，見史伯璿，《四書管窺》卷八，頁927-933。

¹⁰¹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論語集註大全》卷一，頁6a-b。

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跌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

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歡而怨，必狼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¹⁰²

此類麗辭都可添入，然則建陽書坊刊刻《大全》時所謂「頒降原本」，豈不令人失笑？由書坊學者增補《大全》之舉，可窺見明代舉業經學與商業出版的密切聯繫。

（四）名物制度的考據：宋元朱子後學考據學的餘緒

然而，無論是講究字句揣摩、章節大意、前後關聯還是偶麗修辭，難道劉刻對《大全》的增補只是增加了這些科舉經學的風尚嗎？事實並非如此。以《中庸大全》及《或問》增加的「通考」為例：《中庸》原本為《禮記》之一篇，其中有不少涉及名物制度的內容。而劉刻增補入《中庸大全》一卷的「通考」中，趙德、許謙二氏之說多有解釋名物制度者。尤其是此卷引趙德之說共 11 條中就有 9 條是補充名物制度；而增入《中庸或問》的 14 條「通考」和「附纂」中，亦有 10 條是補充名物制度和字音字義。其實，《大全》之大注與小注已經徵引《周禮》《禮記》《史記》等以解釋《中庸》經文；然而劉刻並不滿足於此，凡言及名物制度之處都增加了「通考」，補充相關考證。如經文言「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朱熹《章句》僅言先公為組紺以上，並不詳言世數，小注僅鈔錄〈周本紀〉了事；而「通考」引許謙說則以《世本》等辯正《史記》不可信。¹⁰³ 又如經文言「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章句》無說，小注只言「蓍所以筮，龜所以卜」；而「通考」引趙德說則因龜卜之法久亡，而綜合《中庸》鄭注、《周禮》《儀禮》《大戴禮記》《爾雅》及〈龜策列傳〉等材料探討龜卜之制。¹⁰⁴ 再如經文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朱熹《或問》已對天子廟祧之制有所解釋，而「通考」引趙德說，則據宋李心傳《三禮辨》和陳祥道《禮書》言禘祫時群昭、群穆各只用一尸，以補正朱熹之說。¹⁰⁵ 凡此皆與朱子所重、舉業所用的微

¹⁰²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大學章句大全》，頁 44a。

¹⁰³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中庸章句大全》，頁 53a。其說蓋據〈周本紀〉《索隱》和《正義》。

¹⁰⁴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大學章句大全》，頁 84b-85a。

¹⁰⁵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刻本），《中庸或問》，頁 51a-b。

王赫

言大義相去已遠。此後《論》《孟》部分亦然：《論》《孟》部分增補內容比《學》《庸》少很多，然而增補內容中考據的比例很高，所增補趙德、許謙、吳程之說，往往對經文涉及的字音字義、名物制度或人物史事進行解釋和考證。只要看《論語大全》卷一「道千乘之國」節小注引朱子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而劉剡卻恰恰於此下增補吳程和許謙對「千乘之國」戶口和軍制的具體考證，¹⁰⁶ 則可見這種增補行為恰恰體現了與《大全》本旨與應舉重點相去較遠的學術興趣，頗有為考據而考據的意思了。

有趣的是，這些考據名物制度的「通考」內容，原本由元末明初的王元善增補入倪士毅《四書輯釋》，而在《大全》編成後，又由劉剡增補進入《輯釋》的嫡子《大全》。何俊曾經以王柏 (1197-1274)、金履祥及王應麟 (1223-1296)、黃震 (1213-1280) 等朱子後學為例指出「晚宋儒學由思想轉型為學術」的現象，認為「朱學在浙江的傳播使朱學由義理闡釋過渡為經史考辯」。¹⁰⁷ 而上述「通考」所採之作者中，許謙屬於王柏、金履祥之「北山」一脈；吳程乃新安人，亦元代朱子學極盛處；¹⁰⁸ 趙德乃南昌人，¹⁰⁹ 而重視其考據成果的王元善與劉剡則為福建人，亦出自朱子學傳統深厚的地區。因此，劉剡增補進《四書大全》的這些宋元朱子後學的考據學說可以對何氏之論形成補充；而劉剡增補《大全》的行為，完全可以看做宋元朱子後學的考據學實踐在明初的餘緒。

(五) 劉剡增補本的影響力

劉剡對《四書大全》的增補，在明代建陽書坊的科舉講章編纂和出版活動中實屬尋常。文學史界將元代貼近民間，從事戲劇創作的知識人稱為「書會才人」，而元明時倪士毅、王元善這種專為書坊編纂講章，乃至像劉剡這種出身書林，親自參與出版的知識人，則不妨稱為「書坊才人」，《四書大全》到其手中，亦如此前各種講章被修訂續補。王元善和劉剡增入《四書輯釋》和《四書大

¹⁰⁶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劉剡本），《論語集註大全》卷一，頁 13a-b。

¹⁰⁷ 何俊，〈晚宋儒學的轉型與解經方法的變化〉，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235-264。參考溫志拔，《知識、文獻、學術史：南宋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26-32。

¹⁰⁸ 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四九，頁 2902。

¹⁰⁹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頁 2912。

全》的內容，體現了他們本人的學術興趣；而坊本的刊行，又說明此類內容在當時的士子中實有市場。

完全可以斷定，劉剡增補本《四書大全》的影響力在明初迅速超過了內府原本。因為它不僅成為今可見除內府本外所有明刻《四書大全》的底本，還成為有明一代影響最大的民間講章《四書蒙引》所依據的版本，成為明末清初江西張自烈 (1597-1673)《四書大全辯》所辯的版本，成為湖廣王夫之 (1619-1692)《讀四書大全說》所讀的版本，直到清康熙時仍是陸隴其 (1630-1692)《三魚堂四書大全》的底本。而且，後人在閱讀、利用這種增補本《大全》時未必意識到此版本已非永樂原本之面貌：如張自烈批評晚明坊刻《大全》「或纂或刪」，聲稱己書乃「據永樂舊本訂正」，¹¹⁰ 而其底本明為劉剡增補本，何嘗是永樂舊本？黃宗羲等編撰《宋元學案》述及黃寬時，特別指出「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¹¹¹ 其實胡廣、楊榮奉敕纂修時何曾一采其說？上文提出明代《大全》官刻本和坊刻本影響孰大的問題，至此似乎又可窺得一斑了：即使是刊刻《四書大全》這種敕撰功令，內府一座經廠的影響也不如建陽一片書坊，明代商業出版的影響力不亦大乎！

四·晚明建陽余氏刻本的新變

今見明建本《四書五經大全》系列中，沿襲舊風格的小板小字本至萬曆十三年 (1585) 王智泉本《詩經大全》而止；¹¹² 萬曆後期「芝城建邑書林余氏」的橫空出世，盡革元明「四書五經」系列建本舊貌。余氏所刻《五經大全》書板經改補重印，至明末已面目全非；而其所刻《四書大全》則有集評本與無評本兩種，無評本又有翻刻本，說明《四書大全》最為出版者與讀者所留心。

(一) 余氏刊刻的全套《四書五經大全》

建陽十二行本傳刻百年，除行款特異的「正譌四書大全」本外，今可考 14 個《四書大全》版本中，僅有詹氏進德堂本未知具體時代，但根據其餘版本類比，

¹¹⁰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67-1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刻本影印），卷首，頁 439。

¹¹¹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六四，頁 2082。

¹¹² 「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25382092>)。

王赫

當不會晚於明中葉。而進入萬曆後期，這種十二行本在建陽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則是實力雄厚的「芝城建邑書林余氏」所刻《李太史參補四書大全》與《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兩個版本，而後者傳刻尤盛。

余氏是晚明時建陽實力最雄厚的刻書家族之一，刊刻了一整套《四書五經大全》。觀其中三種題「書林余氏全梓」（見附表四），「全」即「同」，晚明校刻書籍常用此字，則這套大書非一人出資刊刻，乃建陽余氏數家合力之家族產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一套余刻本《四書大全》、兩套《五經大全》（本文稱甲本、乙本）以及一套《五經大全》殘本（本文稱丙本）。¹¹³ 前引李子歸已經注意到這套《大全》的部分書名及卷數與內府本有異；實則其內容與明前中期建陽各書坊所刻《大全》並無區別，《五經大全》全同內府刻本，《四書大全》則是劉剡增補本。只是為眩人耳目，如前所述，余氏肆無忌憚地在卷端冠以當代諸「名公」的大名，或曰某「會魁校正」，或曰某「太史參補」；或曰「古本大方」，或曰「官板名儒」，花裡胡哨，體現出典型的晚明建陽坊刻風氣（見附表四）。

余刻新版《四書五經大全》，與明前中期建本相比，不僅在書名和卷數上遠離了內府刻本，更取消了行格，時將原書白文中間的音釋等雙行小字注改為行間旁注，又將上黑口改為白口以標書名（見圖八），顯然受到晚明江南刻書風格的影響。而余氏將板框由嘉靖以後的約17×13公分擴大到約23.5×13.5公分（下欄正文約高21公分），並將篇卷標題及經文字號放至特大，以致白文行款半葉僅6-7行，行16字；大注則半葉11行，行20字，小注小字雙行同，亦較前期建本疏朗。這種在重刻書籍時「易小板為官板」的做法，在晚明的建陽和江南都有出現。¹¹⁴ 余氏又將小注中「某氏曰」用方框或魚尾標出，比明前中期建本上下加粗線更加醒目。此本釐正了十二行本的一些錯誤；然而細看又產生不少新的錯誤。

據其外觀，哈佛藏甲本《五經大全》顯然較早印行，乙本、丙本則較晚，修補版痕跡往往而是，可見這套書曾一再印刷；《易》《春秋》二書後印時還剡改卷端冠名，如將「周會魁校正」改為「陳太史較正」（見附表四）。除《易經大

¹¹³ 甲本63冊，記錄號為990079648290203941；乙本73冊，記錄號為990078783860203941；丙本存29冊，記錄號為990121725470203941。

¹¹⁴ 如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金陵書林晏少溪、朱桃源刻本《鐫彙附雲間三太史約文暢解四書增補微言》之〈敘〉及〈凡例〉，即言本次重刻唐汝諤《四書微言》乃「易小板為官板」。

全》卷末萬曆三十三年（1605）牌記可供斷代外，凡「校」字避諱作「較」字處，皆萬曆以後新印。¹¹⁵ 而後印本《春秋大全》卷端將「虞大復校」改為「劉孔敬較正」亦值得關注：劉孔敬（1581-1637）是建陽另一大書坊主劉龍田（1560-1625）之子。¹¹⁶ 又知今東京都立圖書館藏有題「劉孔敬校」之十八卷本《四書大全》，可能即重印余氏刻本。¹¹⁷ 據此可見，建陽劉氏參與了余刻《四書五經大全》的出版，可能接手了部分書板。

此外，金文京曾注意到余刻本《五經大全》板框上方每隔 14-16 頁即出現一次的「眉碼」數字，推測其作用是將每十餘葉編為刊刻和出售的一個最小單位，從而在供應鏈最上游將一書分段分批銷售，以促進資金回流。¹¹⁸ 今考余刻《四書大全》亦然，其「眉碼」從「二」至「百廿」，將全書分為 120 段，平均每段為 15.28 葉，這與《五經大全》五種及金氏所考多種通俗小說的眉碼設置方式一致。如金氏所言，「眉碼」體現了晚明建陽書坊生產和銷售策略的精細化。而今考上述《五經大全》經修補、剗改的後印本，其「眉碼」已多磨滅，因已有全套舊板，不必再分段銷售，「眉碼」就失去了意義。

而余刻《四書大全》一書又有翻刻者。今存周譽吾留畊堂本與映旭齋本外觀一致，而封面分別標「留畊堂周譽吾藏板」和「映旭齋藏板」，當是同板翻印。¹¹⁹ 封面題識避「校」字諱，已是啟、禎間所加（見圖九）；然而正文卷端不避「校」字，則可能刻於萬曆末年。翻刻本的存在，證明了此書之流行。而考留畊堂、映旭齋似皆金陵書坊，¹²⁰ 則可見明末江南作為新興的出版中心，承擔起了印刷發行坊刻《大全》的任務，此點留待下節詳述。

¹¹⁵ 晚明坊刻戲曲、小說等書籍一般不避諱，但經部書籍啟、禎間避諱頗嚴，「校」字尤為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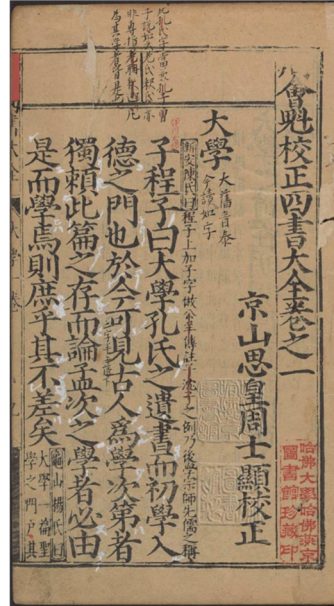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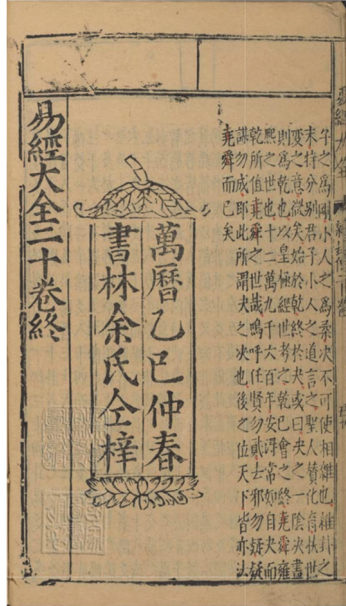
¹¹⁶ 方彥壽，《福建歷代刻書家考略》，頁 303。

¹¹⁷ 請求記號：特 6433，筆者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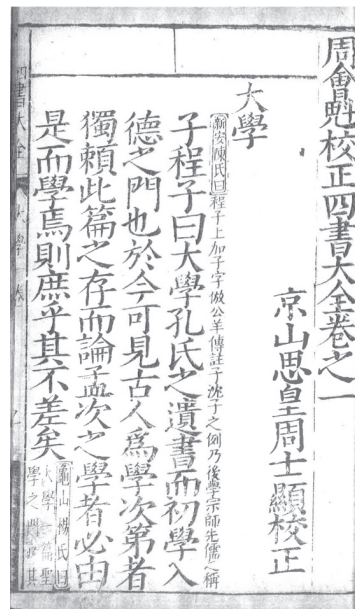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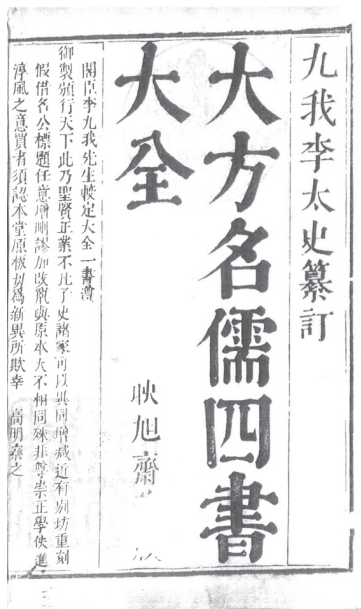
¹¹⁸ 金文京，〈明代建陽の商業出版と通俗小説〉，頁 747-751, 760-762。

¹¹⁹ 前者為南京：南京圖書館藏本，後者為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本。翻刻本略微降低了板框，如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建陽余氏刻本《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板框長寬為 23.7×13.6 公分，映旭齋翻刻本則為 22.9×13.6 公分；且翻刻本改四周雙邊為單邊。

¹²⁰ 參見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 經部》第 1 冊，頁 254；《中國古籍總目 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5 冊，頁 2237；《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 6 冊，頁 3038。《子部》之「得月齋周譽吾」似即《集部》之「金陵周氏得月齋」。



圖八：《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晚明書林余氏刻本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圖九：《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翻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明末映旭齋印本
(上海圖書館藏)

（二）集評本《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大全》及其與無評本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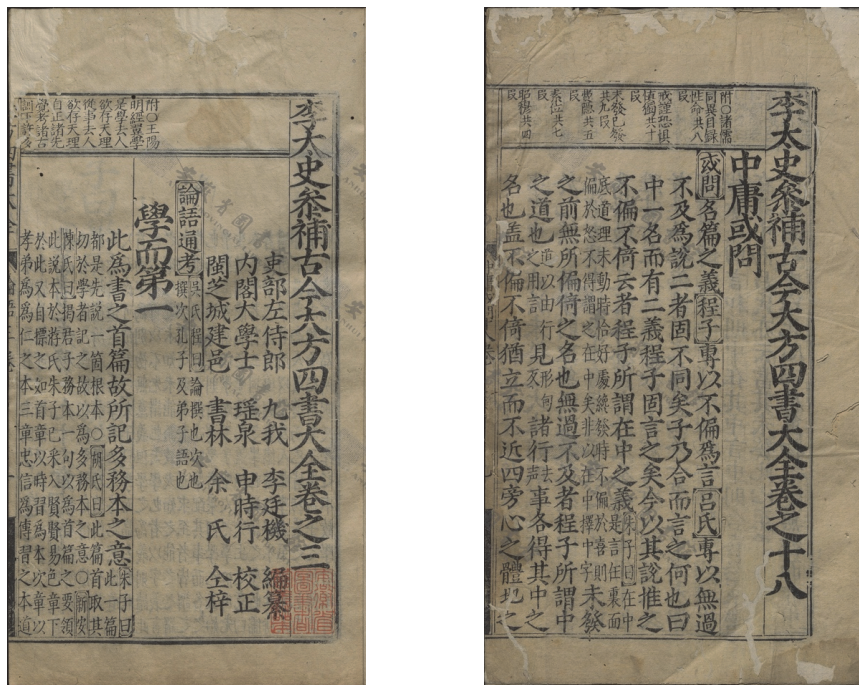
尚有一現象值得注意：余刻本《四書五經大全》，皆於正文的天頭眉評位置設計了板框（見圖八）。「兩節本」建本並不罕見，然而整套余刻《大全》的眉評欄不著一字，全留空白，則不知何故。而筆者於安徽省圖書館得見《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後，方知此上欄之原本用途。此本版式、行款皆同前述《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板框尺寸亦近。¹²¹ 而二者最大的區別，即此本上欄纂輯「諸儒同異」（見圖一〇）：如《大學大全》一卷，即徵引明中葉以後蔡清（1453-1508）、王守仁（1472-1529）、陳琛（1477-1545）、林希元（1481-1567）、袁黃（1533-1606）、李廷機、姚舜牧（1543-1662）等 18 家說共百餘條。所纂輯基本都是明儒「今」講，以補充宋元「古」說，故書名稱「古今大方」。

此書之版式、字體，以及託名李廷機和申時行的做法，都與萬曆二十八年（1600）余象斗（1560?-1637?）刻本《九我李太史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萬曆三十二年（1604）「閩建書林余氏」刻本《九我李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十分相似。¹²² 研究者已發現余象斗刻書最愛託名李廷機，¹²³ 而象斗又是余氏書坊主中佼佼者，故此「芝城建邑書林余氏」中蓋有他相當的地位。

¹²¹ 板框尺寸為 23.8×13.8 公分。

¹²² 前者有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三十九卷；後者有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二十一卷。

¹²³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頁 245。



圖一〇：《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晚明書林余氏刻本
（安徽省圖書館藏）

然則同出於余氏的集評本（「李太史參補」本）與無評本（「周會魁校正」本）《四書大全》孰先孰後？當是集評本在先而無評本在後。因為若無評本誕生後方有纂輯眉評之事，則無評本不應有空白上欄；故當先有集評本，後將集評刪除，又將卷端的名公標題翻新。證據是，無評本內翻新不盡的痕跡昭昭：卷一卷端書名為「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卷末書名卻仍作「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一四卷端書名更徑作「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可見其所自。

余氏新版《四書大全》刪除上欄的集評，可能是為了配合同系列《五經大全》的誕生：若聘請評注家為整套《五經大全》作同樣集評，則成本蓋不低。但到明末，翻刻無評本流行的原因，則或不僅是經濟因素使然，而是與崇禎帝即位後，扶持正學，表彰《大全》，反對新奇之說的指示有關。¹²⁴ 蓋如二本內封面題識云：「閣臣李九我先生較定《大全》一書，遵御製頒行天下，此乃聖賢正業，不比子史諸家可以異同增減。近有別坊重刻，假借名公標題，任意增刪，謬

¹²⁴ 三浦秀一，〈張自烈《四書大全辯》與明末清初的士風〉，頁 203。

加改竄，與原本大不相同，殊非尊崇正學，扶進淳風之意。¹²⁵ 買者須認本堂原板，毋為新異所欺。」其所指或即余刻集評本，或為明末各種刪節、改編本，要之這種尊重原本《大全》的態度代表了明末學風的一種動向，但其所謂「原本」依然是劉刻增補本。

（三）集評本中的「明儒異同」：以「王陽明格物致知說」為例

《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的上欄所纂輯「諸儒同異」之說，實則主要是「明儒異同」；¹²⁶ 而萬曆時期，能代表「明儒」與「宋儒」分庭抗禮的，當然非王陽明莫屬。這位冒李廷機之名的編纂者，其所輯上欄集評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大篇幅的陽明之說。《大學》乃陽明於「四書」發揮最多之處，故此書卷一《大學大全》和卷二《大學或問》的上欄中，編纂者不僅記錄了「《大學》古本」之章節次序，又從《傳習錄》〈大學古本序〉和〈大學問〉等文獻中輯錄和彙括了王陽明有關《大學》的幾乎所有論述。最後，集評者作出了自己對「王陽明格物致知說」的概括：顯然他對王陽明「以誠意為主，以格致為工夫；以本然之靈覺為知；以至其本然之知為致知；以意所在之事為物；以實用為善去惡工夫為格物；調理在心，不得於物上窮理；謂知行合一，不得以格致屬知」¹²⁷ 的《大學》新說極其熟稔，而將其增入《大全》的做法，至少在客觀上宣傳了陽明之說，故編纂者總結王說曰：「是皆然矣。」

然而，緊接此話頭，編纂者在上欄的狹小空間內繼續展開評論：他提及「世儒或謂其功涉徑省」的批評意見，故開始大量徵引程朱之說來反駁陽明。但是，他反駁陽明的邏輯並非否定其觀點（前已以為「然」），而是證明程朱之學已經涵蓋了陽明學的面向：首先，他大量徵引程朱語錄中與陽明之說相通之處，如因程子「格物莫若察之於身」之說，證明程子亦重視「在本原身心上做」，而非僅「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又如因程子「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之語，以證程子亦重視「誠意」；又如將朱熹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及「已知之理」解釋為「天然自有之良知」，以證明朱子未嘗「舍心之外，求物之理」。總之，編纂者試圖證明程朱之學「該內外、兼博約」，陽明之學並不出其外。故他下斷語曰：

¹²⁵ 「扶」，圖九中封面文字作「佚」，經詳細考察，乃補刻「學扶進」三字時之誤。

¹²⁶ 胡廣等纂修，題李廷機參補，《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晚明建邑書林余氏刻本，合肥：安徽省圖書館藏），卷二，頁1a。

¹²⁷ 胡廣等，《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二，頁48b-49b。

今試合程朱數說而觀陽明氏之所談論，有一不統于其中者乎？蓋道理本一，議論同歸，而工夫微有異者，朱子以致知、格物為究理，以誠、正、脩為體理；陽明以格物兼知行，兼舉致知、正心、誠意，而後其功始備。要以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何至議論紛紛，任意駁哉？¹²⁸

而接下來，他則欲通過徵引陽明自相矛盾之處，來證明陽明其實亦不忽視「聞見」知識：

陽明之駁晦翁，則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心與理為二」；而自為說答歐陽崇一，則曰「日用之間，見聞酌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見流行，除卻見聞酌酢，亦無良知可致」，又曰「……良知不滯於聞見，而亦不離於聞見」，不知亦「一分一合」言之乎？而其所謂說與朱子亦有異乎？大抵後儒立論，不免勝心，至以朱子為「義外」，篇中所云云，多不平心之論。¹²⁹

最後，編者對這一段公案進行評論：

大抵學者根基不同，造詣亦別，惟其語入，無所不可，豈必自標一說，以身為鵠，而必欲天下從之耶？學者各務真脩，毋騰口說，可與入道矣！¹³⁰

顯然，編纂者批判陽明，並非以為其學說與朱子本質有異，而恰恰是以為其說本與朱子「同歸」，卻必欲「自標一說」而多「不平心之論」；他重視的不是朱王之「異」，而是其「同」，體現出鮮明的折衷傾向。而朱子所謂「知」真的等於陽明所謂「良知」嗎？陽明所謂「良知不離於聞見」真的等於程朱所謂「格物窮理」嗎？編纂者的話語中並未給這些問題留下探討的空間。

王學在晚明大行其道，並入侵科舉制度，迫使禮部官員多次表態欲釐正學風與文體，¹³¹ 官方亦曾「欽降條約，首遵傳註」，「黜非聖之書，首飭學臣，悉遵朱註、《大全》正說」。¹³² 這在晚明的「四書」講章市場中，即體現在官府

¹²⁸ 胡廣等，《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二，頁 52a-53a。

¹²⁹ 胡廣等，《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二，頁 53a-54a。

¹³⁰ 胡廣等，《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二，頁 54a-b。

¹³¹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一八，頁 1053-1056；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64-165, 177-178。

¹³² 唐汝諤輯，《刪補四書微言》（明萬曆四十年序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首，〈刪補四書微言例〉，頁 1b；題張明弼輯，張溥編纂，《尺木居輯諸名公四書尊註講意》（晚明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首，〈纂輯大全講意說〉，頁 4a-b。

糾正學風與文體時，坊間會出現標榜自己不受時習熏染而仍宗程朱的講章。周啟榮指出，這些講章有時採取陽奉陰違的策略；¹³³ 但如前所述明末留畊堂與映旭齋重印「原本」《四書大全》，以示「尊崇正學」，則確實是尊重明初官方功令的體現。而此集評本《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雖然吸收以陽明為代表的時興新說，但採取程朱本位與折衷話語，亦能顯示出當時思想界的一種立場；而此書作為坊刻科舉用書，則證明這種立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代表當時知識人中普遍的、流行的學術和思想趨向。

五·晚明江南新刻本及其流行

在建陽余氏刻本《四書五經大全》占領建本市場的同時及稍後，隨著晚明坊刻書業的中心從建陽逐漸轉向江南，《大全》的刊刻也延伸到南京和蘇州。而這一時期，江南《大全》尤其是蘇州刻本被翻刻、翻印極為頻繁，可見其流行。

（一）南京德壽堂刻十一行本

晚明時，《四書大全》在南京出現了德壽堂新刻本。¹³⁴ 德壽堂為金陵唐富春之書坊，今考崇禎間同時又刻有《五經大全》（見附表二），¹³⁵ 筆者曾見《禮記集說大全》全帙。¹³⁶ 據此本無統一卷數、附楊榮〈書後〉以及有劉刻增補的內容，知其出於建本，但難以確定此本的底本是較早的十二行本還是較晚的余刻本。此本將《中庸章句》析為二卷，又將《學》《庸》共五卷統一計數。半葉 11 行，行 23 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魚尾上方標書名，全用方體字（見圖一一）。而《五經大全》則版式與行數皆同，唯每行少一字作 22 字。十一行本《大全》系列，與萬曆三十二年（1604）唐富春所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版式、行數皆同，¹³⁷ 且版心下方均有「德壽堂梓」四字，¹³⁸ 故時代蓋約略相近。

¹³³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65-166.

¹³⁴ 開封：開封市圖書館藏。

¹³⁵ 杜信孚纂輯，周光培、蔣孝達參校，《明代版刻綜錄》（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卷六，頁 30a。

¹³⁶ 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¹³⁷ 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¹³⁸ 《周易大全》版心鐫「德壽堂梓」本，見「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67090284/>）；《書經大全》版心鐫「德壽堂梓」本，見「孔夫子拍賣網」

王赫

河南省開封市圖書館藏《四書大全》版心除「德壽堂梓」字樣外，時有記錄本葉字數，可見其為原刻較初印；而此後，德壽堂本《四書五經大全》的書板在江南地區的轉讓頗為頻繁。筆者得知者，有「金閩舒琳溪梓行」本《四書大全》存三卷，與德壽堂本字畫相似，書板有斷裂，而版心無「德壽堂梓」字樣，蓋即舒氏據德壽堂原板在蘇州翻印，而鏷去原堂號；¹³⁹ 又有「留畊堂藏板」本《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首一卷，¹⁴⁰ 版心下方保留「德壽堂梓」四字，蓋即上文提到的「留畊堂周譽吾」得板後印本。



圖一一：《四書大全》晚明德壽堂刻本（開封市圖書館藏）

(<http://www.kongfz.cn/30600427/>)；《詩經大全》《春秋大全》版心鐫「德壽堂梓」本，見山口大學附屬圖書館，《明倫館·山口明倫館·越氏塾舊藏和漢書目錄》（山口：山口大學圖書館，1989），頁 1-2。

¹³⁹ 「孔夫子舊書網」(<https://book.kongfz.com/19622/3609923074/>)。

¹⁴⁰ 「雅昌拍賣」(<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149890033/>)。

(二) 蘇州詩瘦閣刻八行本

而約略同時，蘇州的顧凝遠「詩瘦閣」又於崇禎九年（1636）刊刻了一種新版《四書大全》。¹⁴¹ 此本亦無統一卷數，附楊榮〈書後〉，有劉刻增補內容，故當亦從建本出。半葉 8 行，行 21 字，白口，左右雙邊（見圖一二）。而詩瘦閣同時又刊刻了《五經大全》之《易》《書》《詩》三部（見附表二），可見其經濟實力之雄厚。而《大全》系列之外，詩瘦閣刻書今見不多，似非純商業性書坊，今考諸館藏目錄僅見崇禎八年（1635）刻仿宋本《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崇禎九年（1636）刻《松陵集》十卷。¹⁴² 其所刻八行本《四書五經大全》行款疏朗，美觀但增加了卷帙，實更接近傳統上所謂「私刻」而非「坊刻」的性質。

然而，這並不妨礙八行本《大全》成為坊間的暢銷商品：詩瘦閣首倡後，翻刻、翻印者接踵而至，且紛紛加以內封，冠以名公，純是坊刻風氣。筆者所見，第一種衍生本題崇禎間進士徐汧（1597-1645）訂正，有「吳門德馨堂梓」本和「古吳趙敬山梓行」本，¹⁴³ 前者似鑿去詩瘦閣號而翻印，後者點畫、諱字微異又有新刻工姓氏，當是趙敬山重刻本。¹⁴⁴ 又據日本江戶初翻刻本，知這種「徐九一先生訂正」版八行本《四書大全》尚有「金閨五雲居藏版」本（見附表五）。¹⁴⁵ 第二種衍生本則題明末大儒黃道周（1585-1646）校正，有「關西堂發行」本與「敦古齋藏板」本（見附表五）。¹⁴⁶ 而敦古齋本乃翻刻詩瘦閣本而成，其版式、

¹⁴¹ 東京：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藏。又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存《論語考異》一卷、《孟子考異》一卷，《孟子考異》卷末有顧凝遠刻書跋。

¹⁴²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第 1 冊，頁 259-260；第 6 冊，頁 2986。

¹⁴³ 前者為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後者為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按：在晚明南京和蘇州的《四書五經大全》刊刻中，「趙敬山」似乎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刻工姓名。除「古吳趙敬山梓」本《四書大全》外，筆者又見十一行本《詩經大全》存三卷《詩序》一卷及《春秋集傳大全》存二十一卷，封面均題「德壽堂訂正」，「金陵趙敬山梓」，版心下方亦有「德壽堂梓」四字，見「孔夫子拍賣網」（<http://www.kongfz.cn/1959496/>）；「孔夫子舊書網」（<https://book.kongfz.com/34983/1113891050/>）。則趙敬山在明末南京與蘇州皆有活動，或即唐富春德壽堂所僱傭之刻工。

¹⁴⁴ 趙敬山本避「校」「檢」而不避「由」字；楊榮〈書後〉中「朱熹」之「朱」不作「侏」，序葉版心題「徐」。

¹⁴⁵ 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¹⁴⁶ 前者乃廈門：廈門大學圖書館藏，信息採自中國高等教育數字圖書館「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ttp://rbsc.calis.edu.cn>）；後者見「孔夫子舊書網」（<https://book.kongfz.com/240418/1903496847/>）。

王赫

序文、「大注」中字與「小注」小字全同詩瘦閣本，唯獨白文變為極寬極扁的方體大字，且由每行 21 字改為 20 字，可稱晚明第四種《大全》風貌。

崇禎間出現並風靡江南的八行本，可能亦有意迎合前述崇禎帝推崇程朱正統學術的態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見詩瘦閣本於《四書大全》中《論》《孟》二書與《易》《書》《詩》三部《大全》分別附有王應麟《考異》一卷。所謂「考異」，其實即將《困學紀聞》中某卷摘出單刻，如《論語考異》即《困學紀聞》卷七〈論語〉。¹⁴⁷ 其中皆考據類內容，如《論語考異》首條，從經文有子、曾子稱「子」談起，綜合各書記載以考辨二子之學行；次條則討論《春秋左傳正義》所引《論語》與今本異文問題；再次條則討論訓詁問題。其中多匯總宋儒考據之說。

王氏之考據學成就今不贅述，¹⁴⁸ 需指出的是，王氏的考據類著作非常受晚明出版家歡迎，他們喜歡刊刻王氏《詩考》《詩地理考》《小學紺珠》等卷帙不多的作品，更從《玉海》和《困學紀聞》中摘錄內容單刻，如胡文煥刻《格致叢書》時，亦將《困學紀聞》卷三〈詩〉摘出，題為「困學紀詩」，鍾惺輯《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亦收此書。喜輯短篇小帙，隨意割裂書籍，自是典型的晚明風氣；而除此之外，也應該看到將《考異》附於《大全》刊刻，體現了晚明人對考據學的理解和追求。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孟子考異》末葉，保存了崇禎九年(1636) 顧凝遠的刻書跋：

宋儒闡發聖賢之言，名理已略盡；至伯厚王先生，觀厥世道之盛衰、人心之澆樸，乃博擷群英，羽翼名教，俾孔孟微言神明益茂，五經奧義瀚海旁通。先生自言曰：「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匪竊矜著述之繁，足備諸儒之鼓吹，而典刑具在，誠聖人之徒也！特錄之以附經傳之末。

回顧前所引述何俊將宋末王應麟作為「晚宋儒學由思想轉型為學術」之代表的觀點，再看顧氏此跋，豈非發今人之先聲？再看顧氏將王氏《困學紀聞》中的考據性文字附刻入《四書五經大全》，則可見晚明儒學與晚宋儒學相似，亦在「世道」「人心」之變中經歷著由「名理」向考據的潛移默化；即使是在宋元義理經學的最典型代表《四書五經大全》文本中，也可見這種學風的變遷軌跡。

¹⁴⁷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頁 308。

¹⁴⁸ 參考溫志拔，《知識、文獻、學術史》，頁 84-86, 155-157。



圖一二：《四書大全》明崇禎九年吳郡顧凝遠詩瘦閣刻本
(附《論語考異》《孟子考異》) (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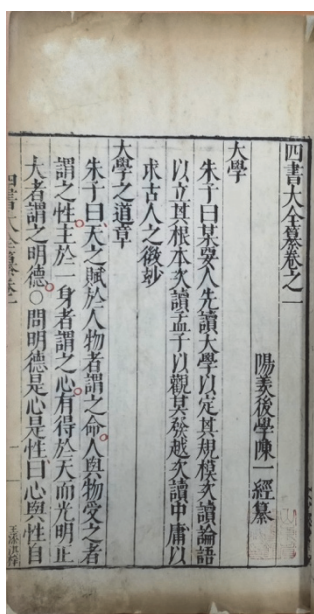
六·明末《四書大全辯》與復社

儘管如上所述，晚明時期無論是建陽、南京還是蘇州，都出現了劉刻增補本《四書大全》的新刻本，這些新刻本不僅體現了對程朱正統的堅守，更顯示了考據學風的興起；然而，晚明文化風氣極其多元，在《大全》出版依然繁榮的同時，自萬曆以後，士人「不讀《大全》」的現象也逐漸明顯，至明末清初情況尤甚。¹⁴⁹ 彼時即使讀《大全》者，也可讀其節本，如萬曆末出版的《四書大全纂》，不僅不錄白文、大注，小注也僅存十之三四（見圖一三）；或隨著舉業時文風尚的變化讀各種將《大全》刪節再與其他經說合編的書籍，如崇禎間徐奮鵬(?-1642)《纂定古今大全》（見圖一四）、張溥《四書註疏大全合纂》（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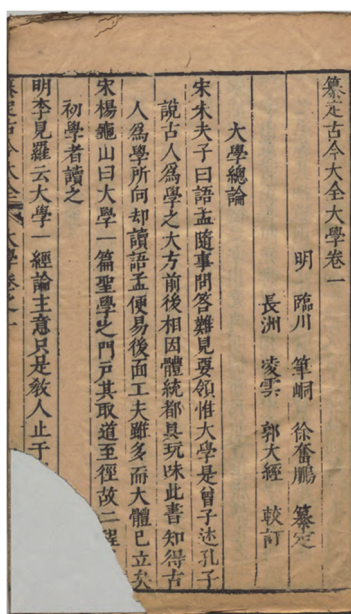
¹⁴⁹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 29-30。

王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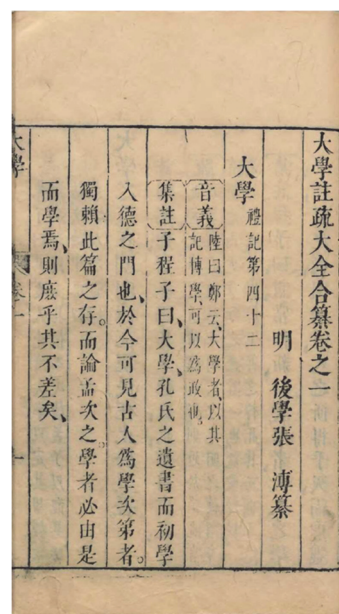
一五），分別將明人時新之說、漢唐注疏之文與《大全》條目合編，離《大全》原貌已相差甚遠。而針對坊間這種對《四書大全》「或纂或刪」¹⁵⁰的現象，評點家張自烈號稱要重新修訂《大全》，以保證學術之純正；而他對「永樂原本」（實際亦即劉剡增補本）的大肆批駁，又體現出鮮明的明末學風。



圖一三：陳一經《四書大全纂》明萬曆刻本（山東省圖書館藏）



圖一四：徐奮鵬《纂定古今大全》明崇禎刻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一五：張溥《四書註疏大全合纂》明崇禎刻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一）張自烈與《四書大全辯》

張自烈是江西宜春人，崇禎間南京國子監生，他從未考取進士，依賴明末江南高度發達的科舉文化和出版市場謀生。他是復社中人，且黃宗羲稱他為復社成員在南京組建「國門廣業社」的核心，¹⁵¹ 故張氏「與艾南英為同鄉而各立門

¹⁵⁰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頁439。

¹⁵¹ 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陳定生先生墓誌銘〉，頁185。

戶，以評選時文相軋」。¹⁵² 崇禎十三年（1640）刻本《四書大全辯》卷首有一份廣告〈石嘯居書目〉，列出張氏編撰的 29 種書，包括「行世」「即出」以及「嗣出」者。其中已行世的著作以八股文評選本為主，但亦有《批評陶淵明集》；而「即出」與「嗣出」者，則除《四書大全辯》外，更包括《古今理學辯疑》《史學辯疑》《古詩文辯》《批評性理大全》《刪評王陽明全集》等宏偉的評選計畫。¹⁵³ 這份書目只能代表張氏事業的一部分，此外張氏編書估計尚多，如大型字典《正字通》。

明瞭張氏是一位職業的時文選家與圖書編者後，才能夠對他作《四書大全辯》一書的背景與動機作出全面的判斷。張氏自言其置辯於《四書大全》的理由冠冕堂皇：因為《四書大全》編纂時，「值國家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謬于聖人」，其中很多內容雖出自程朱後學，而實「牴牾經傳」，因此永樂《大全》只能算是「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亟需加以修訂，¹⁵⁴ 此張氏所以必「辯」之由。然而，對《大全》的這種批評在晚明早已不是新觀點；¹⁵⁵ 張自烈的評書、編書之慣習告訴我們，其作《四書大全辯》與評選時文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內容上皆為科舉服務，通過出版獲利當是操觚目的之一。正因如此，其書能夠代表當時比較普遍的、流行的學術和思想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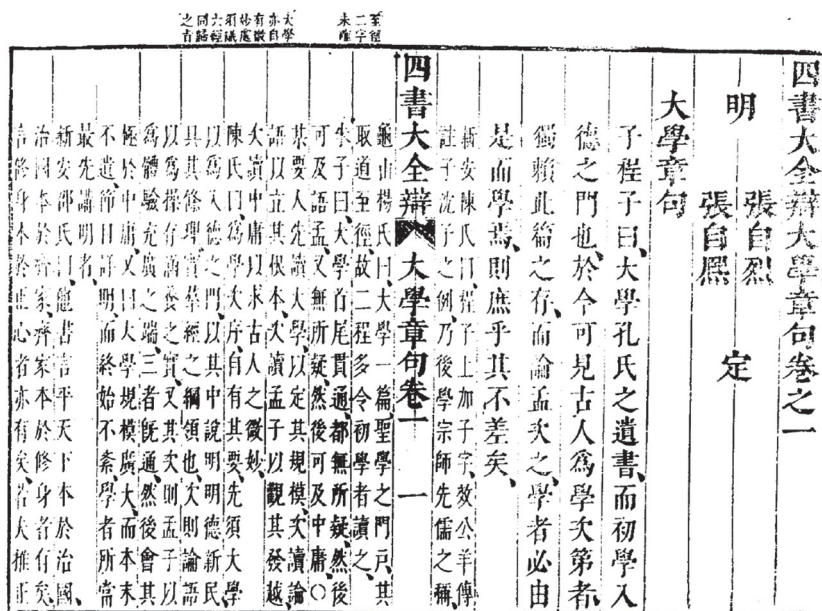
張氏雖「辯」《大全》，但在形式上尊重《大全》原書（其實是劉刻增補本）的權威，對《大全》原書的改編處，僅是將原本分散的諸條「大注」「小注」匯總到白文每章之末，絕不刪削原文。而對《大全》的辯駁發難，則從「橫」「縱」兩個方向展開：無論是直接對《大全》文字發難，還是徵引明人新說以示所希，張氏都或附注於章節之左，或眉批於板框之上，有時針對同一處文字所發「宜刪」「可刪」等判詞既出現於眉批，又出現於附注，對《大全》原文形成「全方位夾擊」（見圖一六）。事實上，張氏之辯駁不僅針對小注，亦時而直接批評朱熹大注。

¹⁵²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頁 314。

¹⁵³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石嘯居書目〉，頁 455-457。

¹⁵⁴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四書大全辯自序〉，頁 507-509。

¹⁵⁵ 參考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頁 33-35。



圖一六：張自烈《四書大全辯》明崇禎十三年刻本
 (新鄉市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二) 張氏的辯駁原則與學術立場

張氏對劉刻本《大全》的辯駁和刪削，參考其書前之〈大全辯略〉，可歸納為三種主要類型，今以《大學大全》一卷為例說明。首先，是對原書中重複及贅餘之說予以徑刪。如上節所述，劉刻在增補《大全》時增入大量南宋吳季子《大學講義》之文，蔓延繁冗，與《大全》原書體例實不相侔，因此，《大全辯》屢言其說「詞煩義寡」「無深意」「無發明」而「可刪」。¹⁵⁶ 其次，《大全辯》之辯體現出重「大意」，求平實的解經態度，特別反對「磔裂」「牽綴」與「穿鑿」之說。¹⁵⁷ 所謂「磔裂」指一意強分為二；所謂「牽綴」即強行解釋上下文關聯；所謂「穿鑿」即牽連他意，橫生枝蔓。舉一「穿鑿」之例，如傳第三章「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劉刻所補「通考」之「黃氏洵饒曰」：「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

¹⁵⁶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10, 624, 656。

¹⁵⁷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芑山大全辯略〉，頁 515。

也。」張氏眉批曰：「不必如此立說。」又出注云：「此說無深義。信如黃氏所云，則君臣與父子等，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敬，亦當先言臣矣。况白文雖置『爲父止慈』于『爲子止孝』之前，而父不慈，子不可不孝的道理未嘗不寓于其中，何必如此穿鑿立說乎？」¹⁵⁸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總之，張氏非常反感這種「說書不見大意，紛紛穿鑿」的方法。¹⁵⁹ 而如前所述，這些「礫裂」「牽綴」或「穿鑿」的尋章摘句實為《大全》的特點之一，而劉剡增補本因有意於揣摩舉業，亦迎合了這種風格。有鑒於此，張氏欲刪除此等文字，而將學者的眼光帶回經文「大意」上。

而《大全辯》第三類置辯處，則是義理之誤，即〈大全辯略〉所謂「腐迂不合理，後學不可不辯者」。¹⁶⁰ 而恰恰是這些張氏「不可不辯」之處，反映出明中葉以後學者的學術立場及「四書」學觀點對《大全》的挑戰。例如張氏〈大全辯略〉中所舉一例，直接反駁朱子小注中「『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知言養氣為不動心之本」的說法。因為張氏認為孟子之學「只在心上用功，能集義，則知言養氣自包括在裏面」，朱子之說本末顛倒。¹⁶¹ 再以《大學章句》一卷為例，其中對義理的討論，體現出「理」「氣」不分，「心」「理」不分，「心」「事」不分，以及「知」「行」不分的鮮明立場。如經文「在明明德」，大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劉剡增補小注「景氏星曰」：「『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眾理、應萬事』，此『德』之實。」張氏下按語：「景氏一條又云『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尤分裂破碎之必不可從者。」¹⁶² 此不分理、氣也。又如經文「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小注引「朱子曰」：「『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劉剡增補小注「黃氏洵饒曰」推衍云：「『知止而后有定』說理，『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張氏批朱子曰：「『定』『靜』分屬心、理，未確。」批黃氏曰：「心、理分屬處支離了，此條可刪。」¹⁶³ 此不分心、理也。再如經一章，小注「雙峯饒氏」

¹⁵⁸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24-629。

¹⁵⁹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55。

¹⁶⁰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芑山大全辯略〉，頁 517。

¹⁶¹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芑山大全辯略〉，頁 519-520。

¹⁶²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599, 602-603。

¹⁶³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599, 604。

王赫

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張氏批曰：「分析『心』與『事』，亦未確。」¹⁶⁴ 此心、事不分也。再如傳第三章「《詩》云『瞻彼淇澳』」節小注「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爲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張氏批曰：「知行分難易，可乎？」¹⁶⁵ 此不分知、行也。這些批駁意見雖出張氏之胸臆，而顯然亦是明末陽明心學流行時，在「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知行合一」等觀點和「理氣不分」的傾向影響下的產物。¹⁶⁶

綜上，《大全》代表的由朱子後學推向程式化、穿鑿化的程朱正統學術真顯「腐迂」，真乃「不可不辯」，而不得不刪者。而《大全辯》異於朱子之尤明顯處，則是對《大學》文本的態度。在《大學》卷前，張氏特冠以《古本大學》《程明道改正大學》《程伊川改正大學》各一卷，這種形式傳達出如下的意思：朱子《章句》所定今本《大學》是歷史地形成的，並非天然地比二程改本或「古本」更有價值。而在《古本大學》一卷，不僅加眉批以疏通其脈絡，更將王陽明〈大學古本序〉附於其末，又引吳麟瑞 (?-1644)〈古本大學通〉之文為之鼓吹；而在《大學大全》經文「聽訟」一章處，則加眉批引蔡清《四書蒙引》云：「前輩皆疑此為釋格物致知之錯簡，況以連下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尤順。」¹⁶⁷ 又提出另一種異於朱熹《章句》，而在晚明流行的《大學》改本。

然而，雖然張氏頗為關注陽明學，但在某些關鍵問題上必須堅持他所標榜的正統立場，或至少表現出一種折衷。如在《大學大全》經一章後，張氏繼續引「或曰」來為「《大學古本》于聖經後首揭誠意」辯護，又自下按語論「格致」義曰：

理雖在物，格物仍是我去格。朱子云「『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非也。

然而，緊接著話鋒一轉，他最終依然要批評陽明：

¹⁶⁴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01。

¹⁶⁵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26。

¹⁶⁶ 關於明中葉以後的「理氣不分論」及其與王學的關係，參見山井湧，《明清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頁 149-194；上田弘毅著，李慶譯，〈明代思想中的氣——王守仁和左派王學〉，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420-433。

¹⁶⁷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 629。

「格物」之說，紛紛無定解。……至陽明駁「即物窮理」之說，自謂「致良知」為確不可易，此尤見理未親切處。蓋朱子雖就事物上求，良知亦在其內，未嘗舍理而專索之于物，安見其泥物而不求之于知？未嘗析物與理而為二，安見其析心與理而為二？陽明似未免立意操戈耳。¹⁶⁸

這種反駁的邏輯，何嘗陌生？雖充分吸收了新興王學思想，但因為要堅持朱子學的立場，故而進行折衷，強調朱子的「格物」說並非「義外」，實已包含陽明心學的面向，從而最終指責王陽明實未跳出朱子學之畛域，不應刻意標新立異。如此種種，與前述約萬曆間建陽余氏刻本《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的上欄編者，豈非如出一轍？晚明王學的影響力人盡皆知，然而它如何滲透到正統程朱學術陣地中，直至坊間科舉用書的層次，以及正統話語如何應對，建陽和江南的這兩部《大全》可共作絕佳的例證。

（三）《大全辯》的獻書與復社力量

《大全辯》的意義，並不限於學術與商業出版領域：張氏欲獻此書以挑戰永樂原本《大全》的權威，自己取而代之。這一事件不屬於本文著重討論的商業出版領域，然而和《大全》的坊刻一樣體現出明代社會中《四書大全》的可塑性。關於張氏獻書之始末，前人考論似尚未詳明，今復略加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張自烈獻《四書大全辯》的活動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動員了復社力量參與：崇禎十二年（1639）九月，楊廷樞（1595-1647）、陳名夏（1601-1654）等一批舉人、貢生、監生，先於張自烈本人上揭帖於南京國子監，請求對《大全辯》一書「俯垂鑒定，特賜表章，或進之經筵，或頒之鼓篋，先移南北禮部，行文江西提學道，檄示袁州府宜春縣，督本生重訂，速梓行世」。此事進展順利：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袁州府、宜春縣即要求張氏將此書「抄錄正副二部」呈送，以動用府縣官銀刊刻。¹⁶⁹

然而，張自烈沒有把書稿交給官府。據張氏後來回憶，此書「遠近購者踵至」，最終由某人出資刻於南京，是為金陵本，由杭州人何執印行；¹⁷⁰ 此本當

¹⁶⁸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一，頁612。

¹⁶⁹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公請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一揭〉，頁440-441；〈袁州府行宜春縣原牌〉，頁448。

¹⁷⁰ 張自烈，《芑山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6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序卷之二，〈刪定四書大全辯序〉，頁192。

王赫

即前述石嘯居本，但今見石嘯居本聲稱由「書坊人何慎、王茂等」「自備資本刊刻」，且請應天府下令嚴禁翻刻。¹⁷¹ 總之，此書實有市場，本不患刊刻乏資；而張自烈等人當時的目的，則不僅是此書得到地方官府的認證，而是要將此書傳達至皇帝處。因此，崇禎十三年（1640）正月，陳名夏等人又上第二揭，請求江西官員具題上奏，「恭請皇上御製序文，刊布天下」。他們特別指出，如不經皇帝御覽頒布，則雖《大全》原書訛謬處亦不敢自行刪改。¹⁷² 張自烈本人也上疏，指出其獻書最終目的是「恭請皇上御製序文，賜名《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亦即享受與永樂間《四書大全》完全相同的待遇。¹⁷³

然而，此事呈報至巡按江西御史徐養心處後，到崇禎十六年（1643）徐氏才上奏此事，終於獲得了「既係倡明理學，該部速覆」的聖旨，而禮部覆議又遲遲不出。¹⁷⁴ 逾年明亡，而南明弘光帝即位後，江西本地諸生仍呈第三揭，欲「恭請今上御製序文，徧布學校」。¹⁷⁵ 崇禎十七年（1644）十月弘光帝下旨「《四書五經大全辯》每鈔十部進覽」，並於次年四月遣人督辦。但張自烈很不滿意：他並未言《五經大全辯》已成書，且朝廷要求進呈刻本卻不言出資。¹⁷⁶ 又經歷諸多坎坷後，新版《四書大全辯》終於在順治八年（1651）由江南提學官資助出版，其中有降清的陳名夏相助。¹⁷⁷ 新版中，張自烈終於將此前大加批駁的段落盡行刪削；然而時移世易，新版《大全辯》不再有任何政治特殊性。

如周啟榮所言，明末士人為張氏《大全辯》三上揭帖，「所表達的不再是一個國子監生的個人意見，而是公共輿論」。¹⁷⁸ 因此，這次獻書相較明代一般的獻書行為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考慮到張氏的復社背景，則其政治色彩尤顯濃厚，如郭沖所言，這是一場「復社群體的政治性活動」。¹⁷⁹ 在獻書兩揭帖首署名的楊廷樞、陳名夏、魏學濂（1608-1644）、吳應箕（1594-1645）、錢禧、劉城（1598-1650）、沈壽民（1607-1675），皆為復社幹將；其他附名者今不可考，而為

¹⁷¹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抄刻應天府告示〉，頁 454-455。

¹⁷²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卷首，〈公請具題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二揭〉，頁 449-451。

¹⁷³ 張自烈，《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頁 36-37。

¹⁷⁴ 張自烈，《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頁 37-38。

¹⁷⁵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清順治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首，〈公請頒布四書大全辯第三揭〉，頁 36a-39b。

¹⁷⁶ 張自烈，《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回奏鈔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頁 38-39。

¹⁷⁷ 三浦秀一，〈張自烈《四書大全辯》與明末清初的士風〉，頁 207-208。

¹⁷⁸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239.

¹⁷⁹ 郭沖，〈晚明出版與政爭〉，頁 47。

《大全辯》作序者，尚有復社名士姜曰廣（1583-1649）、周鏞（1559-1644）與方以智（1611-1671），則此書的黨社背景不可謂不濃厚。尤其重要的是，張自烈與楊、陳、魏、吳、錢、劉、沈都是崇禎十一年（1638）在南京發布著名檄文〈留都防亂公揭〉，討伐「逆黨」阮大鍼（1586-1646）的署名者，¹⁸⁰ 吳應箕與周鏞更是其中最核心人物。¹⁸¹ 考慮到上〈留都防亂公揭〉之後一年，這群士人就獻《四書大全辯》，逾年又必求御覽頒行，其獻書應當視為黨社行為。謝國楨言「吳應箕在金陵的草〈防亂公揭〉是復社的分局」，¹⁸² 而獻《四書大全辯》則是這個「分局」的第二次公共性運動；相比〈留都防亂公揭〉直接參與政治，這次獻書則是復社在學術、文化領域的乘勝追擊。他們的目的絕非僅在刻書，而是涉足國家正統學術功令的解釋權，此等野心當不僅出自張自烈本人。同理，弘光朝〈公請頒布四書大全辯第三揭〉帖首題名者中錢謙亨、羅日崇、彭立節三人，以及將其意見轉達給弘光帝的御史周燦，均見於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¹⁸³ 而當時得勢的阮大鍼則以禁「偽學」為由，不僅阻撓弘光帝新刻《大全辯》的旨意，還欲查毀金陵本舊版《大全辯》，¹⁸⁴ 則可見這一獻書運動在南明的餘緒。據此回看崇禎本《四書大全辯》的「師友參訂姓氏」部分，列名者竟多達 486 人，《四庫全書總目》詔曰：「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即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¹⁸⁵ 其實，這一名單應當參照張溥主盟復社，刊刻《國表》時「詳列姓氏，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¹⁸⁶ 與〈留都防亂公揭〉「列名者百四十餘人」¹⁸⁷ 的做法來理解，才能洞察《四書大全辯》一書是如何成為張溥歿後以復社為代表的江南士人用以展示力量的工具。

¹⁸⁰ 吳翀輯，《復社姓氏錄》（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都防亂公揭〉，頁 1a-2a。

¹⁸¹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七四，頁 7032；卷二七七，頁 7093。

¹⁸²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頁 153。

¹⁸³ 張自烈，《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回奏鑲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頁 38；井上進，〈復社姓氏校錄附復社紀略〉，《東方學報》（京都）65（1993）：548, 582, 588-589。

¹⁸⁴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卷五八，頁 2734-2735；郭沖，〈晚明出版與政爭〉，頁 48-49。

¹⁸⁵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頁 314。

¹⁸⁶ 井上進，〈復社姓氏校錄附復社紀略〉，頁 629。

¹⁸⁷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七七，頁 7093。

七·餘論：書坊與書齋中「變動不居的經典」

本文的討論，庶幾能補充學界對晚明商業出版與學術風氣的認識。周啟榮分析晚明「四書」科舉用書的多元性時，曾特地指出其所見 70 餘部大多在萬曆及以後刊刻的「四書」注本中，「沒有一部是胡廣《四書大全》的重刻本」，¹⁸⁸ 然而此乃就有限的調查結果而言。本文所論，或可在周氏結論的基礎上形成更具體而深入的認識：我們看到，不僅在明末江南《大全》依然反覆刊印，而且即使在學風悖離程朱正統最甚的萬曆後期，建陽書林也出現了新版《大全》。需要加以考察的，是層出不窮的新刻本呈現出的各自不同的面貌：有明一代中，劉刻於《大全》增加更適於應舉的內容；而劉刻增補的其他內容和顧凝遠的附刻又補充朱子學一脈考據學的成果；余刻本和張自烈則在其中纂入與朱子學不盡相同的見解。可見，在思想與學術最普遍、最流行的傳播媒介——坊刻科舉用書中，明代思想與學術的多元化未必皆表現為劇變的形式，而是在書坊和士人對《大全》的改造中體現出舊與新、正與變的交會。

《四書大全》雖然是正統功令，但在出版管制未曾制度化、常規化的明代並不是銅板一塊，而是一種流動的、可塑的經學資源。如前所述，作為明代長期以來的商業出版中心，福建各級政府時而對建陽書坊施以監管，如前引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按察使司糾正「五經四書」坊本之謬所下牒文，在當時確實起了作用，¹⁸⁹ 前文所述《書經大全》之例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明代官府採取過的類似措施，始終停留在「命令」的層面，而從未上升為常規化的「制度」，葉德輝據此牒文得出「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¹⁹⁰ 的結論，就籠統草率了。就本文所論《四書大全》而言，明前中期建本無論是式樣還是文本，皆已非官修《大全》原貌；至於晚明萬曆後期以後，無論是建陽還是江南，商業出版已全非政府所能控制，在《大全》新刻本之外，更出現大量刪節、改編《大全》而成的書籍，前引牒文中所謂責令「照式翻刊」，不得「另自改刊」的命令，哪還有半點影子。如卜正民 (Timothy Brook) 所言，《大明律》中並無圖書檢查的條文；直至清中葉，因為官方無法有效控制大規模的圖書行銷網路，其圖書檢查也只能呈現為皇帝或官員的「個人行為」而非一種現代檢查制度，自然不會有穩定的效果。¹⁹¹

¹⁸⁸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 163.

¹⁸⁹ 賈晉珠，《謀利而印》，頁 226。

¹⁹⁰ 葉德輝，《書林清話 附書林餘話》卷七，頁 179。

¹⁹¹ 卜正民著，孫竟昊譯，〈明清時期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貿易〉，《史林》2003.3：90-92, 101-104。

而嘉靖五年（1526）福建巡按楊瑞與提學邵銳等上疏請於建陽設專官校勘經籍，朝廷則未允設官，只擬遣侍讀汪佃赴建陽主其事，¹⁹² 汪氏最終亦未成行。¹⁹³ 據此一例，亦可印證明代官方對出版業頗為放任的態度。

在這種環境下，王汎森所謂「一部書一旦刊出後，便從作者手上飛走，而有了自己的生命」，¹⁹⁴ 用來形容永樂敕撰的《四書大全》，再合適不過了。《大全》與北京紫禁城一樣，都是為大明第二祖朱棣建立新權威的工具；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大全》在朝廷中的編纂、刊刻和頒行只是一個開端，它在書坊和書齋中二百餘年的生命歷程可謂豐富多彩。目前為止，筆者所見學界對《四書大全》的討論，很少從商業出版或社會文化的視角深入。而如果得知《大全》頒布不久後，通行天下的閩刻建本就已非官版原貌；如果了解《大全》與〈留都防亂公揭〉一樣，成為明末黨社「示威」的工具，我們是不是可以對《四書大全》在明代的傳播和接受情況，以及相關的明代學術、思想、文化與社會史內容有更深入的認識呢？

學者劉勇有言：「變動不居的經典文本，是因為有變動不居的經濟社會、變動不居的日常生活、變動不居的思想觀念、變動不居的各色人等。」¹⁹⁵ 其所論乃就《大學》一篇，而整部《大全》又何嘗不然。儒生、書賈、社員，或兼有二種、三種身分的人們懷著學術的、經濟的、政治的，或兼有的目的來重塑《四書大全》，《大全》在光怪陸離的明代書史中參與了有明一代的社會文化建構和變遷。

（本文於民國一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寫作過程中蒙恩師徐興無教授指導，且根據楊永政、胡錦豪、張謙等師友的指正進行修改；又蒙兩位匿名審稿人及編委會惠賜審閱意見，筆者受益良多。王樂毅、任峭奇兩位學友協助筆者查閱和複製了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¹⁹² 《明實錄》，《世宗實錄》卷六五，頁1498。

¹⁹³ 方彥壽，《增訂建陽刻書史》，頁246。

¹⁹⁴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45。

¹⁹⁵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頁334。

附表一：已知明代《四書大全》刊刻情況¹⁹⁶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或 信息來源
內府本					
1	四書集註大全		明永樂十三年 (1415) 初刻	內府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
建陽十二行本 四十三卷(無統一卷數)					
2	四書集註大全?		明宣德二年 (1427)	建陽葉添德	據楊榮〈書後〉知
3	四書集註大全		明天順二年 (1458)	黃氏仁和堂	浙江圖書館(存三卷) 天津圖書館(存五卷)
4	四書集註大全		明天順間	福建學政游明	上海圖書館(存一卷, 今已不能提供)
5	四書集註大全		明成化三年 (1467)	劉氏翠巖精舍	哈佛燕京圖書館
6	四書集註大全		明成化十八年 (1482)	太原(王氏)善敬堂	北京泰和嘉成公司拍賣記錄(存三卷)
7	四書集註大全		明成化十九年 (1483)	劉氏翠巖精舍	中國嘉德公司拍賣記錄(存七卷)
8	四書集註大全		明弘治六年 (1493)	清江書堂	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日本寬永翻刻本《四書集註大全》知

¹⁹⁶ 版式、行款、字體皆同於表內某本，而無出版者信息的版本不著錄。表中信息除筆者目驗外，主要取自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4冊，頁114；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第2冊，頁262；閔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頁26-28；「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日本所藏中國古籍數據庫「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雅昌拍賣」；「孔夫子舊書網」。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或 信息來源
9	四書集註大全		明弘治八年 (1495)	熊氏種德堂	哈佛燕京圖書館 (存三卷)
10	四書集註大全		明弘治十四年 (1501)	劉氏慶源書堂	南京圖書館
11	四書集註大全		明正德十六年 (1521)	書戶熊富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存一卷)
12	四書集註大全		明嘉靖八年 (1529)	余氏雙桂堂	北京保利公司拍賣 記錄(存十四卷)
13	四書集註大全		明嘉靖十一年 (1532)	魏氏仁實堂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 書館
14	四書集註大全		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	三槐書堂	上海圖書館(存一 卷)
15	四書集註大全		明中葉	詹氏進賢堂	西泠印社拍賣記錄
16	四書集註大全? (即「正譌四書 大全」本)		明中葉		北京琴島榮德公司 拍賣記錄(存六 卷)
建陽九行本 四十三卷(無統一卷數)					
17	四書集註大全		明初至明中 葉?		中國國家圖書館
建陽余氏集評本 十八卷					
18	李太史參補古 今大方四書大 全	李廷機參補 申時行校正	晚明 (萬曆後期?)	芝城建邑書 林余氏	安徽省圖書館
建陽余氏無評本 十八卷					
19	周會魁校正四 書大全	周士顯校正	晚明 (萬曆後期?)	芝城建邑書 林余氏?	臺北故宮博物院 京都大學文學部鈴 木文庫 哈佛燕京圖書館
20	四書大全*	劉孔敬校	晚明	夢松軒	東京都立圖書館
建陽余氏無評本 翻刻本 江南重印本 十八卷					
21	周會魁校正四 書大全	周士顯校正	晚明 (萬曆末刻,明 末印?)	映旭齋	上海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聊城市茌平區圖書館

王赫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或 信息來源
22	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	周士顯校正	晚明 (萬曆末刻, 明末印?)	留畊堂周譽吾	南京圖書館 北京故宮博物院 復旦大學圖書館
江南十一行本 四十四卷 (無統一卷數)					
23	四書大全		晚明	德壽堂	開封市圖書館 (存四十二卷)
24	四書大全	李九我太史訂正	晚明	金閻舒琳溪	孔夫子舊書網 (存四卷)
江南八行本 四十三卷 (無統一卷數) 附《考異》					
25	四書大全附 論語考異一卷 孟子考異一卷		明崇禎九年 (1636)	詩瘦閣	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存考異二卷)
26	四書大全附 論語考異一卷 孟子考異一卷	徐九一先生訂 王應麟考異	明崇禎間	吳門德馨堂	上海圖書館
27	四書大全附 論語考異一卷 孟子考異一卷	王應麟考異	明崇禎間	趙敬山	清華大學圖書館 (存四十二卷附論語考異一卷、孟子考異一卷)
28	四書大全	徐九一太史訂正	明崇禎間	金閻五雲居	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日本翻刻本《鼇頭四書大全》知
29	四書大全**	黃石齋先生較	明崇禎間	關西堂	廈門大學圖書館
江南八行大字本*** 四十三卷 (無統一卷數)					
30	四書大全	黃石齋太史訂正	明崇禎間	敦古閣	孔夫子舊書網 (存一卷)

* 因此本未見，具體信息暫且存疑。

** 因此本今僅見部分書影，今存卷數暫且存疑。

*** 因此本今僅見存一卷，是否附《考異》暫且存疑。

附表二：已知明代《五經大全》坊刻情況¹⁹⁷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1.1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正統五年 (1440)	余惠雙桂書堂	哈佛燕京圖書館
1.2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天順八年 (1464)	書林龔氏明實 書堂	上海圖書館(存 二十三卷首一 卷) 北京琴島榮德公 司拍賣記錄(存 一卷)
1.3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成化七年 (1471)	王氏善敬書堂	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
1.4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弘治四年 (1491)	羅氏竹坪書堂	石家莊市圖書館 (存十卷)
1.5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弘治九年 (1496)	余氏雙桂書堂	四川省圖書館
1.6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正德十二年 (1517) 刻 嘉靖四年 (1525) 重修	楊氏清江堂刻	臨海縣博物館
1.7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嘉靖十五年 (1536)	葉氏作德堂	南京圖書館(存 二十二卷首一 卷)
1.8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嘉靖十五年 (1536)	劉氏安正堂	蘇州圖書館(存 十卷)

¹⁹⁷ 本表僅錄刊印信息較明確之版本。表中信息除筆者目驗外，主要取自《中國古籍總目》；嚴紹盪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頁320-321；「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雅昌拍賣」；「孔夫子舊書網」；「孔夫子拍賣網」。

王赫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1.9	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周士顯校正	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1.10	陳太史校正易經大全(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陳仁錫校正	明萬曆三十三年 (1605) 刻 明末修補重印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哈佛燕京圖書館
1.11	陳太史校正易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明末	樹駿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存十八卷首一卷) 九州大學圖書館 大阪天滿宮御文庫
1.12	陳太史較正易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陳仁錫較正 周士顯校正	晚明	清白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中國國家圖書館
1.13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晚明	德壽堂	河南省圖書館(存二十二卷) 中貿聖佳公司拍賣記錄 北京瀚海公司拍賣記錄(存三卷)
1.14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明末	德壽堂刻 留畊堂印	北京保利公司拍賣記錄
1.15	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首一卷 附易經考異一卷	(考異) 宋王應麟撰	明崇禎間	詩瘦閣	國家圖書館 吉林大學圖書館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2.1	書傳大全 十卷首一卷		明天順八年 (1464)	王氏善敬堂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2.2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書序一卷		明中葉	王氏善敬書堂 刻 劉氏安正書堂 重印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2.3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明弘治九年 (1496)	余氏雙桂書堂	中貿聖佳公司拍賣記錄(存首一卷之書傳大全圖) 北京泰和嘉成公司拍賣記錄(存首一卷)
2.4	書經大全 □□卷 (十二行本)		明前中期		十竹齋(北京)有限公司拍賣記錄(存一卷)
2.5	書經大全 十卷 書序一卷		明嘉靖元年 (1522) 刻 嘉靖十一年 (1532) 印	書戶劉氏刻 書戶劉仕中安 正堂重印	中貿聖佳公司拍賣記錄
2.6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明嘉靖七年 (1528)	楊氏清江書堂	中國國家圖書館
2.7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書序一卷		明嘉靖十一年 (1532)	劉氏明德堂	南京圖書館 中國嘉德公司拍賣記錄(存二卷)
2.8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書序一卷		明嘉靖十五年 (1536)	書戶葉氏	天一閣博物館 (存二卷書序一卷)
2.9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 書序一卷		明中葉	余氏興文書堂	吉林大學圖書館 北京保利公司拍賣記錄(存書序一卷)

王赫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2.10	申學士校正古 本官板書經大 全 十卷首一卷	申時行校正 馮夢禎參閱	明萬曆間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上海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 哈佛燕京圖書館
2.11	書經大全 十卷首一卷附 書經考異一卷	(考異) 宋王 應麟撰	晚明	吳郡顧氏詩瘦 閣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
2.12	申學士校正古 本官板書經大 全 十卷首一卷	申時行校正	晚明	清白堂	中國國家圖書館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
2.13	書經大全 □□卷		晚明	德壽堂	孔夫子拍賣網 (存二卷)
2.14	申學士校正古 本官板書經大 全 十卷首一卷		明末	樹駿堂	大阪天滿宮御文 庫
3.1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明成化元年 (1465)	羅氏勤有堂	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
3.2	詩經大全 □□卷首一卷		明正德四年 (1509)	劉氏安正堂	新發田市立圖書 館
3.3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明正德十三年 (1518)		北京師範大學圖 書館 廣東省圖書館
3.4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明嘉靖元年 (1522)	建寧書戶劉輝	浙江圖書館 龍谷大學大宮圖 書館
3.5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	書林宗文堂	南京圖書館 吉林大學圖書館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3.6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明萬曆十三年 (1585)	書林王智泉	中貿聖佳公司拍賣記錄
3.7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 十五卷首一卷	葉向高編纂 張以誠校正	明萬曆間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北京大學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3.8	詩傳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附詩經考異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詩經考異) 宋王應麟撰	明崇禎間	吳郡顧凝達詩 瘦閣	北京大學圖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3.9	詩經大全 二十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詩序辨說) 宋朱熹撰	晚明	德壽堂	山東省圖書館 山口大學明倫館 孔夫子拍賣網 (存七卷首一卷 詩序辨說一卷)
3.10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 十五卷首一卷	葉向高編纂	晚明	清白堂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3.11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 十五卷首一卷		明末	樹駿堂	大阪天滿宮御文庫
4.1	禮記集說大全 三十卷		明正統六年 (1441)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存二十九卷)
4.2	禮記集說大全 三十卷		明嘉靖九年 (1530)	安正堂	遼寧省圖書館

王赫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4.3	禮記集說大全 三十卷		明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安正堂	中山大學圖書館 日本國立國會圖 書館(存二十六 卷)
4.4	張翰林校正禮 記大全 三十卷	張瑞圖、沈 正宗同校	明萬曆間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南京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4.5	張翰林校正禮 記大全 三十卷	張瑞圖、沈 正宗同校	晚明	長州文氏清白 堂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存二 十六卷) 早稻田大學圖書 館
4.6	禮記集說大全 三十卷		晚明	德壽堂	北京故宮博物院 上海圖書館
4.7	張翰林校正禮 記大全 三十卷		明末	樹駿堂	大阪天滿宮御文 庫
5.1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 卷		明嘉靖九年 (1530)	安正堂	陝西省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5.2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 卷		明嘉靖九年 (1530) 刻 嘉靖十一年 (1532) 印	安正堂刻 劉仕中安正堂 印	安徽省博物館
5.3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 卷		明隆慶三年 (1569)	鄭氏宗文書堂	中國人民大學圖 書館 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
5.4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 卷	虞大復校	明萬曆間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東京大學總合圖 書館 哈佛燕京圖書館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

序號	書名	題撰人 (除胡廣)	刊刻時間	出版者	收藏機構
5.5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晚明	德壽堂	中國國家圖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 孔夫子舊書網 (存二十四卷首一卷)
5.6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卷	劉孔敬較正	晚明	芝城建邑書林 余氏? 劉孔敬?	哈佛燕京圖書館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5.7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首一卷	劉孔敬較正	晚明	清白堂	中國國家圖書館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大垣市立圖書館
5.8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明末	樹駿堂	大阪天滿宮御文庫 (存三十五卷)

王赫

附表三：已知部分明前中期建本《四書五經大全》板框尺寸及行款¹⁹⁸

書名	版本	板框尺寸 (公分)	行款
《四書集註大全》	天順二年仁和堂刻本	22.1×13.4	12行，經20字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天順間游明刻本	19.7×13.0	12行
《四書集註大全》	成化三年翠巖精舍刻本	21.0×13.3	12行，經20字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成化十八年善敬堂刻本		12行，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成化十九年翠巖精舍刻本		12行，經20字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弘治八年種德堂刻本	20.2×12.9	12行，經20字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弘治十四年慶源書堂刻本	19.6×13.5	12行，經20字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正德十六年刻本	19.1×13.2	12行，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嘉靖十一年仁實堂刻本	17.0×12.9	12行，注23字
《四書集註大全》	嘉靖二十六年三槐書堂刻本	17.4×12.5	12行
《四書集註大全》	詹氏進賢堂刻本	17.3×12.6	
《周易傳義大全》	正統五年雙桂書堂刻本	19.2×12.5	11行，經19字注21字
《周易傳義大全》	天順八年明實書堂刻本	18.8×12.2	11行
《周易傳義大全》	成化七年善敬書堂刻本	19.5×12.9	11行，經19字注21字
《周易傳義大全》	弘治四年竹坪書堂刻本	19.6×12.7	11行，注21字
《周易傳義大全》	弘治九年雙桂書堂刻本	19.3×13.0	12行，注23字
《周易傳義大全》	嘉靖十五年安正堂刻本	16.5×12.4	11行，注21字
《書傳大全》	天順八年善敬堂刻本	19.8×12.0	11行

¹⁹⁸ 僅錄年代明確者，以備比較。表中信息引自附表一、附表二中各收藏機構、拍賣機構網站所著錄，以及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提供數位影像中之標尺測量而得之數據；此外見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第5冊，頁122；《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3冊，頁317；第4冊，頁55-56, 94, 114；《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冊，頁127, 262-263；《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2冊，頁71, 76-77；閔春，〈《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頁26-27（其書影不清晰，但顯然乃半葉十二行，正文云十行則誤）；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頁320；「雅昌拍賣」。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

書名	版本	板框尺寸 (公分)	行款
《書經大全》	善敬書堂刻安正書堂重刊本	20.8×12.8	11行，經 18 字注 21 字
《書經大全》	(十竹齋公司拍賣本)		12行
《書經大全》	嘉靖元年刻嘉靖十一年安正堂重印本		11行，注 21 字
《書經大全》	嘉靖十一年明德堂刻本	17.3×13.1	11行，注 21 字
《書經大全》	嘉靖十五年書戶葉氏刻本	16.4×13.0	11行，注 21 字
《詩經大全》	成化元年勤有堂刻本	19.8×12.9	11行，經 21 字注 21 字
《詩經大全》	正德十三年刻本	17.5×13.0	11行，注 21 字
《詩經大全》	嘉靖元年劉輝刻本	17.7×12.8	11行，注 21 字
《詩經大全》	嘉靖二十七年宗文堂刻本	18.2×12.9	11行
《詩經大全》	萬曆十三年王智泉刻本	17.7×13.2	11行，注 21 字
《禮記集說大全》	正統六年刻本	19.6×12.7	11行，經 21 字注 21 字
《禮記集說大全》	嘉靖九年安正堂刻本	16.8×12.3	11行，注 21 字
《禮記集說大全》	嘉靖三十九年安正堂刻本	19.8×13.0	11行，經 21 字注 21 字
《春秋集傳大全》	嘉靖九年安正堂刻本	16.5×12.0	11行，經 21 字注 21 字
《春秋集傳大全》	隆慶三年宗文書堂刻本	18.7×12.9	11行，注 21 字

說明：

1. 長寬數據採自多家，不同測量者所用工具及標準或異。又此類建本書籍刊刻頗隨意，一書中往往前後數卷乃至數葉之板框高低明顯不同，相互比較時需考慮數據之模糊性。
2. 每行之字數，各家計算標準不同。今僅以正文葉為準，見其書或有效書影者，方重新著錄行款，每行字數以頂格計；無有效書影可觀者，則僅錄諸家所記行數。

附表四：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晚明書林余氏刻《四書五經大全》信息

各卷首書名	卷數	首卷題校訂者	牌記或題識
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卷一、三、七、一〇、一三） 周會魁校正古本大方四書大全（卷二） 周會魁校正古本名儒四書大全（卷四至六） 周會魁校正官板名儒四書大全（卷八至九、一一至一二） 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一四） 周會魁刪定四書大全（卷一五至一八）	十八	京山思皇周士顯校正	無
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甲本卷一） 陳太史較正易經大全（乙本、丙本卷一） 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二至一八） 周會魁校正古本官板易經大全（卷一九至二〇）	二十	京山思皇周士顯校正（甲本） 長洲明卿陳仁錫較正（乙本、丙本）	萬曆乙巳仲春 書林余氏全梓
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一、四至一〇） 申學士校正古本書經大全（卷二、三）	十	內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校正 國子監祭酒具區馮夢禎參閱	閩芝城建邑書 林余氏全梓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一至一〇、一四） 詩經大全（卷一一至一三、一五）	十五	禮部左侍郎臺山葉向高編纂 翰林太史瀛海張以誠校正	閩芝城建邑書 林余氏全梓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	三十	溫陵二水張瑞圖、 吳江桐岡沈正宗全校	無
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	會魁金壇虞大復校（甲本） 潭陽若臨劉孔敬較正（乙本、丙本）	無

附表五：晚明江南翻刻或翻印新本《四書五經大全》部分案例¹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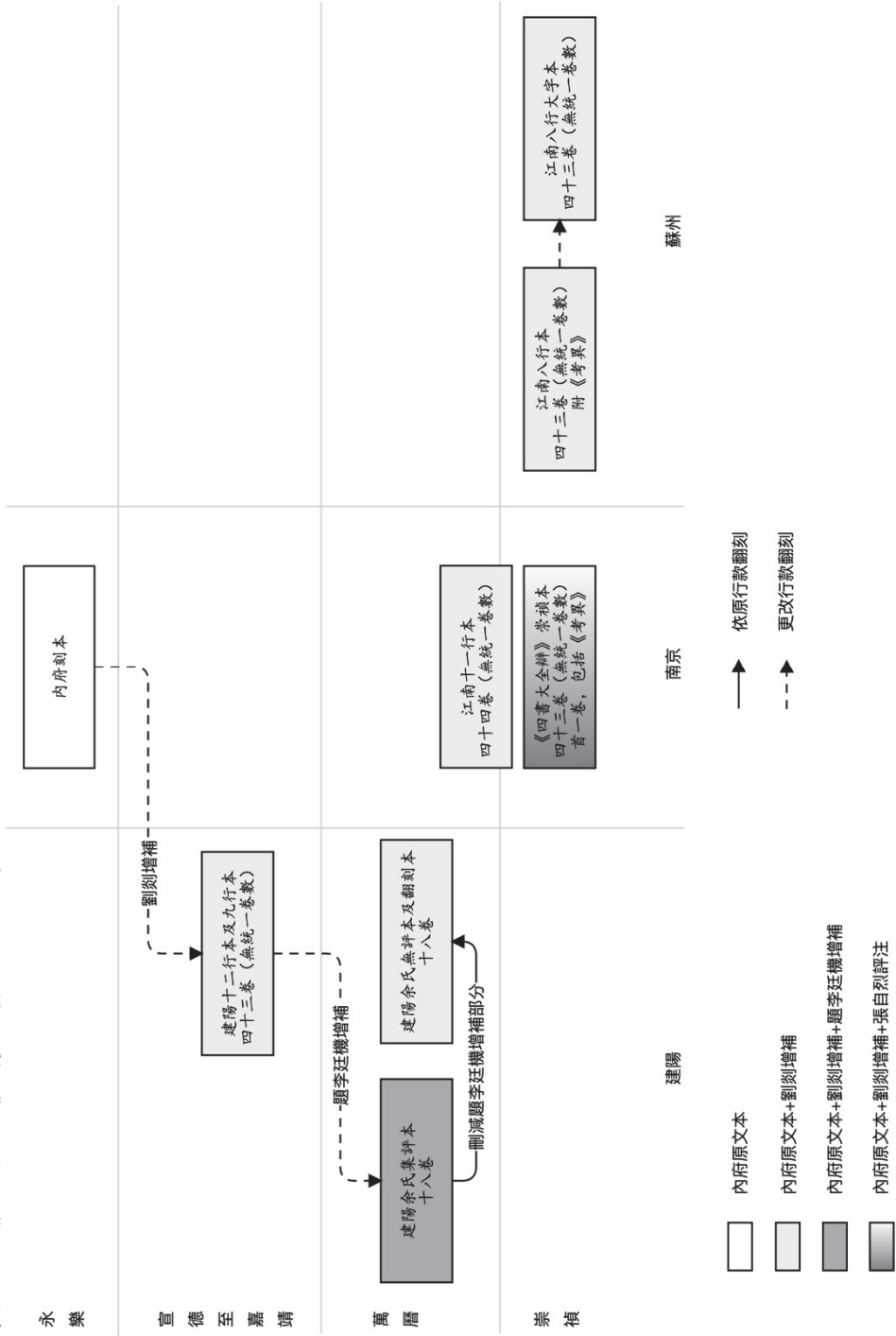
原版本	書名	新出版者	內封面主要信息
建邑書林余氏刻本	陳太史較正易經大全	清白堂	陳太史參補 易經大全 清白堂梓
	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	留畊堂周譽吾	九我李太史纂訂 大方名儒四書大全 留畊堂周譽吾藏板
		映旭齋	九我李太史纂訂 大方名儒四書大全 映旭齋藏板
金陵德壽堂刻十一行本	周易傳義大全	留畊堂	較正重刻 易經大全 留畊堂藏板
	四書大全	金閻舒琳溪	李九我太史訂正 四書大全 金閻舒琳溪梓行
吳郡詩瘦閣刻八行本	四書大全	吳門德馨堂	徐九一先生訂 四書大全 吳門德馨堂梓
		古吳趙敬山	徐九一先生訂正 四書大全 古吳趙敬山梓行

¹⁹⁹ 僅錄筆者得見原書或書影者。書影來自「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孔夫子舊書網」；「孔夫子拍賣網」；「雅昌拍賣」。

王赫

原版本	書名	新出版者	內封面主要信息
吳郡詩瘦閣刻八行本	四書大全	金閻五雲居 (據日本翻刻 本)	徐九一先生訂正 四書大全 金閻五雲居藏版
		關西堂	黃石齋先生較 四書大全 關西堂發行
		敦古齋	御覽頒行 黃石齋太史訂正 四書大全 敦古齋藏板

附圖：《四書大全》明代版本系統圖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王梓材、馮雲濠編撰，《宋元學案補遺》，北京：中華書局，2012。
- 王應麟，《論孟考異》，明崇禎九年跋吳郡顧凝遠詩瘦閣刻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 史伯璿，《四書管窺》，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朱公遷，《四書通旨》，收入納蘭性德輯，《通志堂經解》，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 16 冊。
- 吳翮輯，《復社姓氏錄》，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周尚文校閱，《新刻京本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綱目》，明萬曆刻本，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 林集虛，《目觀天一閣書錄》，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第 5 冊，據黎照廬木活字排印本影印。
- 胡廣等，《五經大全》，明萬曆建邑書林余氏刻明末補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大全》，明末古吳趙敬山翻詩瘦閣刻本，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大全》，明末詩瘦閣刻吳門德馨堂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大全》，明崇禎九年跋吳郡顧凝遠詩瘦閣刻本，東京：東京大學駒場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大全》，晚明德壽堂刻本，開封：開封市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據明內府刻本影印。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天順二年黃氏仁和堂刻本，杭州：浙江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弘治八年熊氏種德堂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弘治十四年劉氏慶源書堂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正德十六年書戶熊富刻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成化三年劉氏翠巖精舍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四書集註大全》，明建陽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胡廣等，《春秋集傳大全》，明隆慶三年鄭氏宗文書堂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胡廣等，《書經大全》，明中葉王氏善敬書堂刻劉氏安正書堂印本，林羅山批校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胡廣等，《書經大全》，明嘉靖十一年書戶劉氏明德堂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禮記集說大全》，晚明德壽堂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胡廣等，《鼈頭四書大全》，日本元祿四年翻明末金閩五雲居藏版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虞大復校，《春秋集傳大全》，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題申時行校正，馮夢禎參閱，《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晚明芝城建邑書林余氏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題李廷機參補，《李太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晚明建邑書林余氏刻本，合肥：安徽省圖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題周士顯校正，《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題周士顯校正，《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翻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明末映旭齋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胡廣等纂修，題周士顯校正，《周會魁校正四書大全》，翻晚明書林余氏刻本明末留畊堂周譽吾印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 倪士毅輯釋，王元善通攷，《四書輯釋通攷》，明永樂四年博雅書堂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倪士毅輯釋，程復心章圖，王元善通攷，《四書輯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初刻本影印。
- 倪士毅輯釋，程復心章圖，王元善通攷，王逢訂定通義，《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明正統詹氏進德書堂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
- 唐汝諤輯，《刪補四書微言》，明萬曆四十年序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王赫

- 唐汝諤輯，潘煥文參定，《鐫彙附雲間三太史約文暢解四書增補微言》，明萬曆四十三年金陵書林晏少溪、朱桃源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徐炳義，《培林堂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19 冊，據民國四年鉛印二徐書目合刻本影印。
- 晁璫，《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7 冊，據明抄本影印。
- 祝穆、富大用、祝淵編，《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明萬曆三十二年唐氏世德堂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67-1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刻本影印。
-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清順治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張自烈，《芑山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尊德修，王吉人、譚篆纂，康熙《安陸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4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2001，據固學齋鈔本影印。
- 張溥，《四書註疏大全合纂》，明崇禎九年序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張溥，《易經註疏大全合纂》，明崇禎七年刻本，天津：天津圖書館藏。
- 許榘，《許氏古韻閣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29 冊，據國家圖書館藏清許氏古韻閣抄本影印。
- 陳世溶，《問源樓書目初編》，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26-27 冊，據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8 冊，據清乾隆六十年長塘鮑氏刻本影印。
- 陳道、黃仲昭纂修，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7-17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影印。
- 馮繼科、閔橋纂修，嘉靖《建陽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41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黃佐，《南廡志》，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 412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明朱絲欄鈔本影印。
- 黃宗羲原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楊榮，《文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0 冊。

- 葉德輝，《書林清話 附書林餘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
-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蔡清，《蔡文莊公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 鄭曉，《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12冊，據黃永年藏清初抄本影印。
- 題李廷機編纂，《九我李太史校正古本歷史大方通鑑》，明萬曆三十二年閩建書林余氏刻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題李廷機編纂，《九我李太史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明萬曆二十八年余象斗刻本，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 題張明弼輯，張溥編纂，《尺木居輯諸名公四書尊註講意》，晚明刻本，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 卜正民著，孫竟昊譯
2003 〈明清時期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貿易〉，《史林》2003.3：90-104。
- 三浦秀一著，石立善校譯
2012 〈張自烈《四書大全辯》與明末清初的士風〉，《哲學與宗教》第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198-218。
- 上田弘毅著，李慶譯
2007 〈明代思想中的氣——王守仁和左派王學〉，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
2010 《中國古籍總目 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a 《中國古籍總目 經部》，北京：中華書局。
2012b 《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北京：中華書局。
-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
2008 《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4 《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赫

方彥壽

2020a 《福建歷代刻書家考略》，北京：中華書局。

2020b 《增訂建陽刻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汎森

2004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朱冶

2019 《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 〈晚明復社與經典改纂：顧夢麟等編《四書說約》初探〉，張藝曦主編，《結社的藝術：16-18 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561-576。

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林慶彰校訂

2014 《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

何俊

2005 〈晚宋儒學的轉型與解經方法的變化〉，鄭吉雄、張寶三編，《東亞傳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初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235-264。

李子歸

2018 〈明代建陽的書戶與書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6：23-47。

李開升

2019 《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杜信孚纂輯，周光培、蔣孝達參校

1983 《明代版刻綜錄》，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

沈津

2006 〈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94-112。

侯美珍

2016 〈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中國文化研究》2016.2：28-36。

孫廣

2020 〈《四書大全》編纂考詳——以《孟子集注大全》為核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 23 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 178-195。

馬學良

2021 《明代內府刻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笠井直美
2013 〈吳郡寶翰樓書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64：256-316。
- 郭沖
2015 〈晚明出版與政爭〉，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
- 閻春
2009 〈《四書大全》的編纂與傳播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逢源
2015 〈從《四書集注》到《四書大全》——朱熹後學之學術系譜考察〉，《成大中文學報》49：75-112。
2016 〈「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孔子研究》2016.1：51-64。
2018 〈重塑道統——《四書大全》中的新安學脈〉，《成大中文學報》63：39-78。
- 溫志拔
2019 《知識、文獻、學術史：南宋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賈晉珠著，邱葵、鄒秀英、柳穎、劉倩譯，李國慶校
2019 《謀利而印：11 至 17 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劉成群
2013 〈「附錄纂疏」體經學著作與「四書五經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經學為敘述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3：62-69。
- 劉勇
2016 《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廣西壯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編
2011 《第二批廣西壯族自治區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
- 錢海岳
2016 《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 謝水順、李珽
1997 《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謝國楨
2014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北京出版社。

王赫

嚴紹盪編著

2007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

顧永新

2014 《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山口大學附屬圖書館

1989 《明倫館・山口明倫館・越氏塾舊藏和漢書目錄》，山口：山口大學圖書館。

山井湧

1980 《明清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井上進

1993 〈復社姓氏校錄附復社紀略〉，《東方學報》（京都）65：537-668。

金文京

2021 〈明代建陽の商業出版と通俗小説〉，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日中韓をめぐる本の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頁739-767。

唐潤熙

2007 〈《四書大全》 판본의 변화와 程朱理學의 演變〉，《中國語文論譯叢刊》20：265-284。

Chow, Kai-wing (周啟榮)

2004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lman, Benjamin A.

2004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三・網路資訊

「孔夫子拍賣網」

<http://www.kongfz.cn>。

「孔夫子舊書網」

<https://book.kongfz.com>。

「雅昌拍賣」

<https://auction.artron.net>。

從《四書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經學、科舉、出版與社會

中國高等教育數字圖書館「學苑汲古：高校古文獻資源庫」

<http://rbsc.calis.edu.cn>。

日本所藏中國古籍數據庫「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

王赫

Printing *Sishu daquan* (*Complete Annotations of the Four Books*):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He Wa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The officially edited *Sishu daquan* 四書大全 (*Complete Annotations of the Four Books*) in the reign of the Yongle Emperor (r. 1402–1424)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status of Zhu Xi's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but was also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classical authority. Al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Sishu daquan*, its commercial publication was also popular within socie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ook until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 The contents of these commercially published editions in the interim were not limited to that of the official edition, revealing the various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orientations of the editors and readership.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extant editions, the commercial editions of *Sishu daquan* thriv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period of the Xuande Emperor (r. 1425–1435) to the mid-Ming followed the style of book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e contents of these editions were supplemented by Liu Shan 劉剡 beyond their official counterpart, and it was Liu's text that was copied by all the subsequent editions of *Sishu daquan*. Many of the materials Liu added to *Sishu daquan* were suitable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meanwhile, others concerned evidential research, which can be viewed as a legacy of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proffered by the Zhu Xi school in the Song-Yuan period. Sometime in the later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Wanli Emperor (r. 1572–1620), the new edition of *Sishu daquan* from a publisher in Jianyang by the name of Yu 余 changed the former style of the book which then became the new popular edition. Yu also produced another form of the supplemented edition that included the new ideas of Ming scholars on the Four Books, especially those of Wang Yangming, thereby providing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Zhu Xi and Wang Yangming schools. Moreover, the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ishu daquan* spread to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and at that time, the reprinting and sharing of the woodblock

of *Sishu daquan* was common. Of the editions, the Suzhou one included *Sishu kaoyi* 四書考異 (*Collation of the Four Books*) by Wang Yinglin 王應麟 as an appendix, demonstrating an intention to turn to evidential research. In Nanjing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Chongzhen Emperor (r. 1627–1644), Zhang Zilie 張自烈 made use of revising *Sishu daquan* to further negotiate the Zhu and Wang schools, and his new edition played a political role in the demonstrations of “Fu She” (Restoration Society) in its later years. Without long-term, effective forms of publishing supervision or authority, *Sishu daquan* was not rigid but a fluid and malleable cultural resource. The life of *Sishu daquan* in the Ming dynasty thus indic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 text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Keywords: *Sishu daquan* (*Complete Annotations of the Four Books*); Confucian classics in Ming China;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Ming China; publishing in Ming China; “Fu She” (Restoration Society)